

華南客家形塑歷程之探究

林正慧*

國史館協修

華南客家的形塑過程，有一個文化共性的形成時期，之後才有第二階段的客方言群意識覺醒期。約於宋元之際，閩粵贛邊區已形成有共同方言與地域文化的一群人，但當時並未被以「客」名之。明清時期，閩粵贛邊區人口飽和，加上清初遷海復界之後，大量客方言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一帶流徙。在這些客方言人群外移的邊緣，客方言人群與以廣府方言為主的「本地人」之關係遂逐漸緊張，進而在19世紀以降頻頻發生「土客衝突」，且在廣府人書寫的志書當中，多被指為「非漢」之種族。土客衝突以及以非漢污蔑客方言移民的情形，引起客方言士子關注，於是為「客」（客方言人群）溯源，強調客方言人群乃中原衣冠舊族，方言亦為中原古音。在此過程中，適逢西教東傳，於是以客方言地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們也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行列，於是約在18世紀中葉，中文的「客家」與西文的Hakka有了指涉相同人群的意涵。客方言士子與西方傳教士為「邊緣客域」的客方言人群溯源美名之後，為「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嘉應州）鋪好了溫床，到了光緒末年的《嘉應州志》，我們已可看出「中心客區」如何思索由文獻中找出「中心客區」為「客」名所出的各種可能。「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之後，開始讓由「中心客區」向外離散的客家有

* e-mail: pipi@drnh.gov.tw

投稿日期：2013年9月27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3年10月20日

了認同的媒介，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城市活動與革命建國等行動，逐漸累積政經實力的同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非漢」污蔑，更讓「客家」的意識與認同得以抬頭，也讓海內外客屬有了清楚的以方言認同的媒介。

關鍵字：華南、客家形成、邊緣客域、中心客區

Exploring the Developing Formation of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outhern China

Cheng-hui Lin*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The developing formation of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outhern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ormation of common culture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Hakka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13th century, a group of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dialect and culture inhabited in cluster along the border area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however they didn't call themselves "the Hakkas"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there was an excessive population in the border area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so the Qing government opened up the coastal areas for them to live in. As a result, a great number of the people who spoke the Hakka dialect moved to the east coastal areas of Guangdong, commonly known as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they lived away from home and rented lands from the local residents, who spoke Standard Cantonese, conflicts inevitably occurred. By the 19th century, conflicts between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Hakkas broke out more frequently. Moreover,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by the Cantonese, the immigrants who spoke the Hakka dialect were described as "fei-han" (not the Han people). Such biased documents on conflicts and the discrimination caused the Hakka literati to be concerned about

* Date of Submission: September 27, 2013

Accepted Date: October 20, 2013

the truth of their lineage. The Hakka elites vigorously asserted that their ancestors came from China's Central Plain, the core birthpla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y emphasized that their dialect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Central Plain, too. In the meantime, the Basel Catholic missionaries, who proselytized in the area, also took part in the developing formation of the Hakka community and culture. As a consequence, the "peripheral Hakka" became the "center Hakka," at least in the Ziaying prefecture.

Keywords: Southern China, Formation of the Hakka Community, Peripheral Hakka, Central Hakka

一、前言

目前學界大多已經同意華南方言與地域文化的差異，是由於歷代北方漢人向南方遷徙，在特定區域內，與特定的土著民族經過一定時間的融合演變的結果（黃金文 2001：13）。但對於客方言人群究竟形成於何時？至今仍眾說紛紜。許多大陸學者認為，若文化共性既已出現，即可宣告客家民系之形成。

梁肇庭 (Sow-theng Leong) 的研究則認為，南遷移民於宋元之際來到閩粵贛交界，因為定居在閉塞山地，之後約有 200 多年是處於經濟孤立的狀態，此為客家民系的醞釀時期。經過醞釀期的蟄居後，由於人地矛盾的進一步加劇，16 世紀以降，原居閩粵贛交界地的客方言人群開始大規模地向外遷移。梁肇庭根據 Fredrik Barth 的族群形成理論，¹ 認為作為族群意義上的客家，就是在向嶺南、東南沿海等地大規模遷徙的過程中，客文化群與其他文化群在接觸的過程中，由於種種人我殊異或資源競爭，不斷強化「我族」與「他族」之間的無形邊界，隨著「邊界」的形成與劃分，一個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族群」便正式形成了（轉引自王東 2005：170-171、181）。

以上二種對華南客家形塑的說法孰是孰非，是本文想要探究華南客家形塑歷程的起點。除了客方言群醞釀或成形的閩粵贛邊區外，本文將客方言人群向外遷徙的區域稱為「邊緣客域」，另將清中葉開始自我詮釋為「客」之發源地的嘉應州及附近連片的潮州府的客方言地帶稱為「中心客區」。由相關文獻及既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客家」一詞源於

¹ Fredrik Barth 將族群視為人類群體組織的一種形式，認為在區辨不同的族群時，「邊界」(boundary) 是一個更好的分析概念。正因為族群疆界是在不同族群互動關係中產生，族群疆界的主要特徵之一，即具有一種可變性。所謂的「邊界」是一種社會邊界，也是一種文化差異來維持的邊界。所謂的族群邊界，似乎是一種受許多客觀因素影響的主觀「異族意識」，也說明族群認同只存在於族群關係之中。如 Fredrik Barth 等學者所言，許多社會與經濟生態因素造成族群邊界，這種邊界透過對內的根本感情連繫與對外的異族感來維持。參照鍾幼蘭 (1994：109-144)、王明珂 (1997：155-159)。

外移的邊緣客域，而非閩粵贛交界區，因此本文主要想了解客家如何在邊緣客域形成，如何反饋回中心客區，以及如何自中心客區向外傳播，這麼一個形塑的軌跡。

二、閩粵贛邊區客方言人群的形成與外移

針對前述二種對華南客家形塑的說法，問題的癥結可能在於將有共同的祖源、方言、生聚地，及文化內涵（以下簡稱「文化共性」）之客方言人群之形成，與有族群意識之「客家」之名出現混為一談有關。許多大陸學者認為，若文化共性既已出現，即可宣告客家民系之形成。如汪毅夫表示，遲至南宋，贛閩粵交界地區，特別是贛南、閩西二片區，已形成了以稻作農耕為主，包括礦冶在內的山林經濟，及以苧麻紡績為輔的山區農業經濟，有別於相鄰地區的經濟生活，並已形成一種新的方言，於是在生計方式、風俗習慣、語言和社會文化心理等方面都形成了更多的共同點，且以客家方言的形成，即可標誌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汪毅夫 1994：155-158、170）。

謝重光認為，南宋時期閩粵贛已有穩固的共同生活地域，內部文化一致，且已形成與相鄰地區明顯差異的經濟形式、語言風俗、社會心理，因此認為客家民系在南宋時已經形成（謝重光 2001：170、179）。吳松弟則表示南宋時期遷入早期客區的北方移民幾乎都是直接遷入，因此認為約在宋末，中國歷史上即已形成具有北方語言和風俗特點的客家民系（吳松弟 1997：354-357、362）。

王東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以不同形態的客家先民遷入閩粵贛三省邊區大本營地區為基本前提。此過程的開端應是以北方人民大規模南遷運動中止為標誌，其完成以由大本營地區遷出之

居民能在總體上保留其語言文化特色為標誌。因此推論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上限應在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下限則在明代中後期（王東 1996：144-145）。

對於梁肇庭以 Fredrik Barth 的族群邊界理論推斷客家形成的說法，謝重光認為，某一人群或種族集團是否形成一套共同社會和文化特點，只取決於是否有共同的經歷、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是否和別的人群發生矛盾無關（謝重光 2001：172-177）。汪毅夫也表示種族集團自覺意識本身存有缺陷，以之判定客家民系的形成更有矛盾，因此主張某一人群或種族集團是否形成一套共同社會和文化特點，只取決於是否有共同的經歷、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是否和別的人群發生矛盾無關（汪毅夫 1994：172、178）。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客家」一詞，並非一個地域或地理名詞，也不是一個以籍貫做為分類的標誌。客方言人群不同於其他華南漢族民系以生聚地域為名，而終選擇一個具有臨時性、不確定性的「客」，作為我群之稱謂，這樣的選擇結果，意味著其中必有一個與不同人群之異質文化接觸的過程，即其中有一個「客」由他稱到自稱的過程。

本文認為，由於客方言人群最終選擇以「客」為我群自稱，且這個方言群的最後型態是跨省的方言群認同，則若僅言文化共性之形成即可宣告客家形成之說法，除了忽略以「客家」為方言或人群之名，並非一個由來已有的概念，即「客家」並非文化共性（或方言）形成即產生的身分認同或方言認同，進而可能忽略了「客家」的形成其實經歷了一個從他稱而自稱的演變過程（宋德劍 2002：5-12）。此外，也忽略了「客」稱可能存在一個由邊緣反饋回中心再向外傳播的過程。

學者們以客方言出現推論客家即已形成的階段，從宋元明相關文獻來看，雖然閩粵贛交界地帶不同方言人群已被清楚識別且留下紀錄，卻

未見有以「客」稱之的情形。如比較二則同出於宋人之筆的描述，陳一新〈跋瞻學田記〉中言汀州「風聲氣習頗類中州」（陳一新 1962：699）；劉克莊〈木綿舖〉中言漳州「風煙絕不類中州」。可見在時人眼中，汀、漳二州雖境土相連，但方言文化迥然不同的現象已十分明顯。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引宋代《圖經志》曰：「潮之分域隸於廣，實古閩越地。其言語嗜欲與閩之下四州頗類，廣、惠、梅、循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海豐于潮為近，語音不殊。至潮、梅之間，其聲習俗又與梅陽之人等」（轉引自汪毅夫 1994：166）。據此可知，宋代潮州、梅州已各有土音，彼此不能相通，而介於潮、梅之間的居民所操的方言則與梅州方言相同（汪毅夫 1994：166）。

明人王世懋《閩部疏》曰「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駢舌彌甚」。這裡提到的福建方言約有三類，建、邵之間由於移民從江西來，故帶豫章音；福州至泉州，對於說吳語的太倉人王世懋來說有如鳥語，故稱駢舌彌甚；至於汀州一帶則和贛南、梅州方言一致，故云其雜虔、嶺之聲（汪毅夫 1994：166-167）。

由上可知，南宋至明之前，與閩粵贛邊區相關的文獻記載，都沒有以「客」來指涉某一群人或某一種方言的記載。對於認為文化共性形成可標誌客家民系形成之學者，顯然無法理解為何宋元明文獻沒有對客家民系的描述，如汪毅夫認為，《太平寰宇記》中，北宋時雷州地區就有「客戶」²的記載，由此推論在贛閩粵邊區，「客」之名出現的那麼晚，值得懷疑（汪毅夫 1994：170）。因此曾多方查找文獻，發現一則《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書院」中，有南宋淳祐年間「賣劉民揭陽縣深浦客洞田七十三石四斗」之記載，推論該「客洞田」指的是位於某客家

2 作者對此「客戶」特別註明「此作為族群區分之名，不同於戶籍制度上以土地、資產多寡為標準區分的主戶、客戶」，顯係有誤。

聚落的一處田地，並認為若此推測無誤，南宋時即已有人以「客」來稱呼閩粵贛邊區新形成的民系了（汪毅夫 1994：170-171）。然僅此一孤證，且「客」在中文書寫上原本就有其固定意涵，多指外來的、後來的，即古籍文獻上絕對不乏「客」之書寫，但是否指涉某一方言或人群，就需多方資料的相互印證了。若對照上述清初以前的文獻皆多已注意到一群使用特殊方言的人群的存在，卻又未以「客」名之的情形，則此孤例可能略嫌單薄。

綜上可知，南宋以降在閩粵贛邊區已有一個文化特徵相同或相似的地域文化，使用相近的方言，但就已有的文獻資料來看，這個地域文化，這種方音，或是使用這種方音的人群，雖已或多或少被識別出來，但多仍只以不同的地域名別之，並未被以「客」名之，遑論以「客」自稱。這似乎意味著，如果我們想在宋元明的文獻中找尋閩粵贛交界地帶的「客家」，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文獻中我們雖然可以看到客方言與其他方言不同的區別，以及客方言連片的特色被記載下來，進而了解，當時在閩粵贛邊區居住著一群具有獨特語言和風俗的人群，但當時皆以地域名之，不以「客」為名。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北方的移民來到閩粵贛邊區後，經與當地以畚族為主的原住民互動之後，多已「反客為主」（李如龍 2000）。換言之，從五代趙宋到明初，閩、粵、贛三省交接地帶，既不存在一塊「客家」基本住地，也不存在唐宋以來稱「客家」的居民（劉鎮發 2001）。意即，「客」之得名，不在於閩粵贛的客方言形成區域，而應是發生在外移的「邊緣客域」。

明清之際，閩粵贛邊區因山多田少，戶口日增，加上天災頻仍，饑荒漸有嚴重化的趨勢（施添福 1987：165），於是「閩廣諸省之人散處各方」（王維新 1989：卷六·田賦），開始向外謀求發展，遷徙浙江、江西山區、廣東沿海、廣東西部、廣西東部等地，甚至是臺灣、海外。

如浙江山區部分，約從明代末年開始，來自福建汀州的移民即遷入金衢盆地的兩側山地，從事藍靛的種植。清代初年，隨著戰爭導致的土地荒蕪，移民的規模有所擴大，遍布浙南各大山區，繼而在浙西也有分布（曹樹基 1997：1-13）。江西省的部分也是明清時期開始有閩之汀民與粵民陸續移入，多被稱為「閩廣諸省人」、「閩廣流寓」、「閩粵棚民」，或稱「流賊」、「流寓」、「佃客」、「客民」、「新民」、「棚民」、「客籍」、「懷遠籍」等（萬芳珍、劉綸鑫 1994：118；許懷林 2000：100）。客方言人群移墾四川則多在清代初年，由於以廣東籍為多，故多被稱為「土廣東」，客話則被稱為「土廣東話」（李文澤 1995：29）。清領臺後，閩粵移民亦陸續渡臺，清代的客方言人群來自閩粵二籍，但以粵籍為主，故多被稱為粵人或客人。此外，亦有向廣東省南路或廣西省遷徙者。以上這些客方言人群的外移地域，都可視為本文所謂的「邊緣客域」。

向各方向遷徙的客方言人群各自面臨不同的移墾環境，及不同的在地人群，產生各自不同的互動模式。而中國歷史上的「客家」之得名，則是產生於同一時期向南的遷徙過程中，故以下所談的邊緣客域，以向南或西南移墾，而與當地廣府人接觸的廣大地帶為主。

三、「客家」源起於「邊緣客域」的土客衝突

就既有文獻與研究成果可知，華南客家的形塑主要鑲嵌於外移南路與廣府人為主的土著的互動過程中。以下分三個部分加以說明。

(一) 嘉慶年間廣、惠二府的土客衝突與徐旭曾的〈豐湖雜記〉



圖 2 明清時期客方言人群向廣、惠二府遷移地點

明朝以後，居住在粵東北和閩西的客家人不斷入遷惠州各邑山區，如萬曆年間（1573-1620），惠州府之歸善、永安、河源、海豐等縣因

土曠人稀，乃招隔府別省流寓人入境耕種（劉淮年、鄧掄斌等 1966：254-255），其中歸善、永安多興寧、長樂人（劉淮年、鄧掄斌等 1966：843），當地人對這些客民的印象是「久之呼群引類，藐視土著」（劉淮年、鄧掄斌等 1966：254-255）。

明末的博羅也因「曠而稀」，故「興寧、長樂之民負耒而至」，土著對客民的觀感也是「邑流寓地著雜處，地著孱而流寓梗，駁之無道，眾實生心」，或「無授無節，邑人擯之」（顧炎武 1981）。

增城的情況也相類似，「自明季兵荒疊見，民田多棄而不耕」，於是康熙初年，「時則有英德、長寧人來佃於增。村落之殘破者，葺而居之。未幾，永安、龍川等縣人亦稍稍至」，之後又「引嘉應州屬縣人雜耕其間，所居成聚，而楊梅、綏福、金牛三都尤多」（管一清 2001：364-365）。由乾隆《增城縣志》的記載可知，客民初來，由於土曠且「甘為人役」，故土客尚且相安，但之後客民「漸成村落」，乃「呼群召黨，以爭井疆廬墓之利，連阡陌者日盛，搆雀鼠者日紛，而草野敦龐之俗，因以日壞」（管一清 2001：360），呈現的也是土民對客民的不滿。該志中，除了批評客民佃勢凌主、健訟之外，也提及他們的方音與土民有別，且「隸增者，雖世閱數傳，鄉音無改，入耳嘈嘈，不問而知其為異籍」（管一清 2001：358）。

東莞地區的客民也是明末時遷入，由明崇禎《東莞縣志》可知，當時已有一批「閩潮流人」移入。該志中不僅將「客民」置於「外志·瑤」中，且言：

邑之東北七都抵惠陽，山原險曲，閩、潮流人多竄居之，以種藍為生，性多狠戾，號為（玃）獠，所佃田地，每強霸不可禦。（汪運光 1995：992-993）

在提及瑤族之後，復言「近又有流，投附勢家，入歲錢為屬佃，以故認腴田為己物，人不敢問」（汪運光 1995：992-993），可見土客關係的緊張係由於土地的競爭而來。修志者甚至還在篇末提及「此風不息，將有叵測，是豈若輩咎哉」（汪運光 1995：992-993）。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東莞縣志》以「哎」稱外來客民，已隱約出現方言的區別。因為「哎」之稱，係由於客方言中之「謂我為哎，俗謂之哎子」而來（王概 2001：卷四·風俗）。由諸多廣東方志可知，來自客方言區的外來移民，常被稱為「哎子」，如「興寧、長樂人曰哎子」（屈大均 1979：337）；「興寧、長樂音近於韶，謂我為哎，廣人呼之為哎子」（陳昌齊等 1968：卷九十二·輿地略十·風俗）。但《東莞縣志》在論述中故意造出「玃」這個漢字指稱來墾之客民，意將客民貼上非漢標籤，以貶低外來移民的身分（施添福 2011：4）。

在康熙《東莞縣志》中，土民除細數客民如何善下蠱，惑風水，喜利己損人，以及性狠戾，好與我人鬥等奇風異俗與負面行徑外，且在志書中將客民以流人、流玃、玃獠、玃獠等意指非漢的名詞稱之，反映東莞本地人對客民的嫌惡和仇怨發展到一個高點（施添福 2011：6）。

嘉慶年間掌惠州書院的徐旭曾著之〈豐湖雜記〉即是在這麼一個土客之間長期由於生存資源的爭奪，以及語言、文化、習俗間的差異而造成的緊張關係下應運而生。

由於東莞、博羅發生土客械鬥，徐旭曾乃召集門人，告以客人來源及其語言習俗所以不與其他漢人相同之因，對客方言人群之來源、範圍、文化特徵有清楚論述。其中有幾個層面值得觀察：

(1) 清嘉慶年間之前，博羅、東莞地區已發生不同方言人群的土客械鬥，土客之別，在於彼此風俗語言之不同，故言「客者對土而言，土與客之

風俗語言不能同」，徐旭曾甚至認為，就是由於彼此方言分野明顯，以致「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閱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

(2) 「客」之得名，係因別於「粵之土人」，顯見這其中有一個由他稱而自稱的過程，徐旭曾此時已自稱為「客人」，但尚未自稱「客家」。

(3) 描述「客人」為中原衣冠舊族，主張客人源於宋元時期的移民南遷，徐旭曾此種主張，已經超越了個別宗族對祖先來源的追憶，成為客方言群體對共同來源的解釋（陳春聲 2005：50）。

(4) 對客人的忠義勤儉、詩書傳家、耕讀尚武等特質作了相當的描述（嚴忠明 2004：38）。

(5) 已畫出所認知的客方言界域（參見下圖），除汀、贛外，廣東省的部分有嘉應州、惠州府，及潮州府之大埔、豐順，對於廣州府則只提到「龍門各屬」，但未及廣州府南路及廣西之客方言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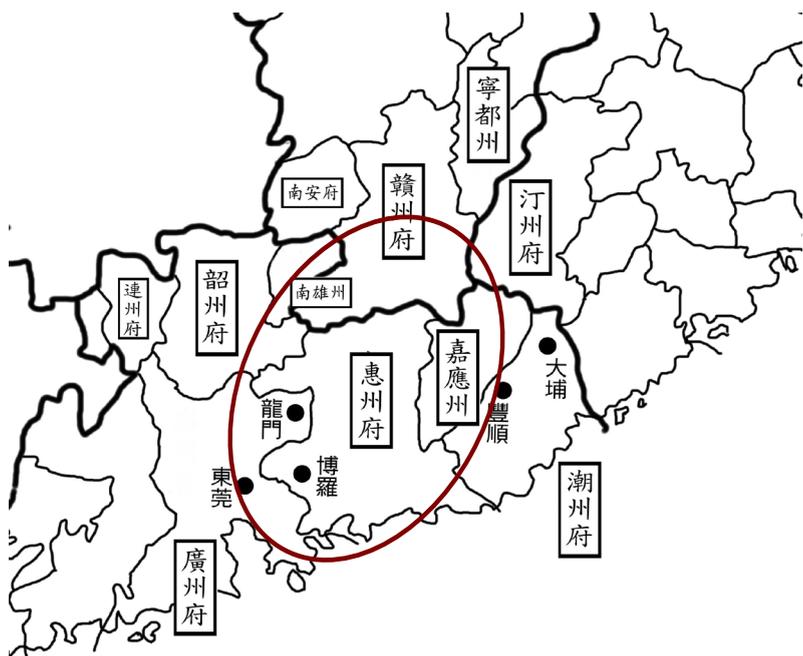


圖 3 清嘉慶年間徐旭曾眼中的客方言分布區

(6) 強調客人語言，近中原正音。關於此點，嘉慶年間的鄭昌時在所著《韓江聞見錄》一書中亦曾言及「其依山而居者，則說客話……而客音去正音為近」（鄭昌時 1979：172-173）。由此，可以了解至少在清朝中葉的嘉慶年間，廣東省境內客方言人群已被明顯的區別出來，且已自稱為「客人」，所使用的方言被稱作「客話」。

陳春聲認為，直至 17 世紀末「復界」以後，韓江流域的宗族組織才在鄉村社會中普遍建立起來（陳春聲 2005：57）。陳春聲這個理解，應該也適用於東江流域或清初被迫遷界的閩粵沿岸地帶。也因此，這些地區的族譜多為 18 世紀以後才編修，而且對祖先源流故事多有基本的

論述架構。就客方言人群而言，流傳最廣的宗族源流，即是將祖源溯及中原或北方地區，接著有一個移居閩西寧化縣石壁村之後再遷居各地的過程。類似這樣的宗族源流，至遲在明末清初即已存在（陳春聲 2005：49）。因此，關於自己的祖先來自中原的說法，對於講客話的人群來說，到了徐旭曾的嘉慶年間，可能已經成為普遍流傳的認知，這可能即為徐旭曾如此表述客人源流的背景。

此外，徐旭曾〈豐湖雜記〉中論說的雖是源於東莞、博羅一帶土客衝突下的「客人」自我定位，但東莞、博羅等地卻位處徐旭曾所描敘的客方言分布地帶的邊緣，此或許與徐旭曾的出身背景有關。徐係惠州府北境的和平縣人，適位於其所畫出之客方言分布地區的中心點，加上之後長期掌教於廣州越秀書院和惠州豐湖書院，其識見不囿於一鄉一族，所描述的客方言群的聚居範圍，已經包括了粵、閩、贛三省的大片地區。此方言界域的畫出，或可推論當時某些客人對與自己同方言人群之分布有相當的認識與了解（陳春聲 2005：50）。

有學者認為徐旭曾〈豐湖雜記〉是一篇客家人宣言，為系統論述客家問題之始，可視之為客家民系形成的標誌（嚴忠明 2004：36、39）。然而，亦有學者持不同看法，如劉鎮發認為，徐旭曾〈豐湖雜記〉中，除了對「客」是他稱的說法是事實外，其他的觀點是有問題的（劉鎮發 2001）。施添福也表示，徐旭曾以方言主義解說本貫主義的「客家」所獲得的結論並不準確，甚至有違歷史事實，而難於為院內諸生澄清「何以仍稱為客」的問題（施添福 2011：24）。

然而，或許我們應將嘉慶年間徐旭曾的「客人論述」，視為時人對「我群」（客方言人群）之理解與認同的現象，也正如施添福所提醒的，徐旭曾的「客人論述」突顯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廣東境內本貫主義下的「客民」與方言界線的高度一致性，此種外移客民的文化特

徵，在人群分類指標由本貫向方言轉移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施添福 2011:24）。而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徐旭曾的「客人論述」所論述的主體是「客人」，尚非之後普遍通用的「客家」。

（二）廣西的來客衝突與太平天國反清事件

客方言人群成批遷入廣西，約始於康熙乾之際，洪秀全於 1850 年（道光 30 年）在金田起義前，廣西東南的陸川、博白、貴縣、桂平、武宣、平南一帶，客方言人群已有數十萬人（劉佐泉 2003:21）。移墾貴縣的閩粵贛移民，被當地的土著稱為「來人」，如《平定粵寇紀略》中稱，「桂平毗連之貴縣，有廣東嘉應州民數千聚居山間，墾田自食，縣民目為來人，常肆凌辱」（杜文瀾 1980:卷一）。同治《潯州府志》也將「來」加「彡」旁，以示非我族類：

[彡]人潯境皆有，惟貴縣繁多。始自廣東、福建、江西遷來者。……男女俱勤農事，不憚辛勞。故春耕秋獲，較之他田獲利倍多。居積之家有田者咸願批與耕種，其廬止跨居田中，旁無鄰舍。然族黨之誼甚篤，遇有仇敵，及好勇鬥狠，一呼百諾，荷戈負鍤而至，警不畏死。故土人、來人常有口角相爭，釀成械鬥之案。（轉引小島晉治 1983:299）

由此可知，移墾廣西的客方言人群同樣面臨與土著的土地競爭，因此關係緊張，鬥案頻傳。



圖 4 客方言人群入墾廣西示意圖

與移墾其他地區的土客情形一樣，廣西「土來」的分界也在方言的異同。一則 1960 年代對當地人的口述資料，清楚地表明了這個現象：

當時我們地方分來土、分宗派很嚴重，講客話的一夥，講土話的一夥，常相械鬥，客人被土人殺死很多。客人講本地土白話，說「石」字很難說成土白話，總或多或少帶有客話音，所以在客土相鬥最尖銳的時候，土人碰見生疏便取一石頭問道：「這是什麼？」如果是客人，以客土各半或完全的客音

說：「石頭」。土人就一刀把客人斬掉。太平天國起義後，客人幾乎逃走，有很多跟太平軍去了，有的回老家廣東去了。經好多年後，客人才又慢慢的回到這些地方來。（黎鶴輝口述 1962：41）

說客話的新移民，就這樣從長期械鬥的環境中，訓練成為精銳的戰鬥集團，而當地的客家人在械鬥戰敗之後，絕大部分都歸附了洪秀全，走上反清的道路（羅爾綱 1947b：95）。

1844年（道光24年），洪秀全、馮雲山開始進入廣西傳教，他們向這個不安而動亂的社會帶來了一個未來的福音。他們因為方言相近，得任意出入客家人的村落以及群眾間，以教學為名，勸人加入拜上帝會。傳教時宣揚凡入會的一律平等，「拜上帝的無災無難，天堂享福」，使當時經濟困頓的農村群眾有了精神上的依靠，因此不多時，洪秀全、馮雲山兩人即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1850年（道光30年）上帝會的勢力，以桂平紫荊山為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南到博白、陸川，北到武宣、象州，在黔鬱兩江流域都有上帝會的追隨者（羅爾綱 1947a：47-51）。據羅爾綱依文獻、口訪等資料的考證，表示太平天國的重要領袖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石達開都是客家人（羅爾綱 1947b：92），追隨者多為貧農、礦工、燒炭工人等，也以客方言人群為主。

1851年（咸豐元年）元月太平天國事起，西方人獲知後立即開始著手蒐集情報加以研究。最早的一本相關著述，是由法人加勒利和伊芳凡以公使館蒐集到的零星報告為材料，所撰之《中國叛亂史》（中文譯名《太平天國初期紀事》）一書。該書於1853年上半年在巴黎出版，同年8月倫敦出版英文譯補本，書中主張太平天國的主

要力量為廣西苗族（張英明、周璐 2005：77-78）。

1854 年巴色會傳教士韓山文 (Theodore Hamberg) 根據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口述撰成《太平天國起義記》(*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一書，在該書中，韓山文已用 Hakkas 字眼稱述客方言人群 (Hamberg 1854: 4)。

由一些文獻可知，太平天國反清時期，在兩廣一帶的客方言人群，也已被稱為「客家」。日本學者小島晉治在〈試論拜上帝教、拜上帝會與客家人的關係〉一文中，刊出他在倫敦公共檔案局抄錄之因參與太平天國被捕的鄧亞滄的供詞，他是廣東北部連州星子人，1852 年（咸豐 2 年）6 月，在湖南南部道州附近的禾洞被清軍俘獲：

..... 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平樂地方遇著黃亞四，糾小的入伙。二十八日到道州入伙 六月初，頭目黃亞四去劫江華縣。分為三隊，第一隊頭人朱亞三，年約二十餘歲，客家聲音，管帶千餘人。二隊頭人陳亞章，亦客家聲音，管帶一千餘人。三隊頭人黃亞四，年二十七八歲，嘉應州人，管帶二百餘人。（小島晉治 1983：292；重點是加上的）

由鄧亞滄的供詞來看，「客家」無疑是當時兩廣一帶廣府人對客方言人群的他稱。

而有趣的是，1859 年（太平天國己未 9 年）刊印，由洪仁玕撰寫的《資政新篇》中，直揭當時接受韓山文傳教而信道的客方言人群為「客家」：

瑞國有一韓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與弟相善，其人並妻子

皆升天，各邦多美其為人焉。愛弟獨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縣地也。（洪仁玕 1969：276）

走筆至此，由韓山文的 Hakkas 對應到洪仁玕所稱之「客家」，中西文對於客方言人群的定義，似乎已趨於統一，而且若以洪仁玕論述與自己同一方言的人為客家，則似乎也表示，客家這一名詞已成為客方言人群可以接受的自稱。

由以上所舉事例來看，至少在 1850 年代前後，在中國華南的外國人，已確立了用 Hakkas 稱述客方言人群的用法，而客方言人群本身，似乎也已用「客家」一詞來指稱自己。或可推知在此之前，客家已為當地流傳之說法，且已由他稱變為當地客方言人群的自稱。

（三）廣肇二府的土客衝突與咸同大械鬥

明清之交，廣、肇等地成為主要戰區，加上清初的遷海復界，使有著綿長海岸線的廣東受害甚巨。清初的珠江下游人口劇減，清廷不得不採取招民開墾的措施。於是原本山多田少的惠、潮人民紛紛移墾廣州府西南的新會、鶴山、開平、恩平等縣（余丕承等 1974：附錄一），咸豐年間（1851-1861）客方言人群進入肇慶府五邑地區達到尖峰，「各縣戶口增至十餘萬不等」（余丕承等 1974：附錄一）。如《赤溪縣志》所載，「客民習勞苦繁生育，又善引族屬，故所在占籍皆能自闢村居，繁殖人口，計由雍乾始遷，以迄咸豐初，僅百十餘年，鶴高開恩等縣不具論，即新寧一邑客民，人口已不下三十萬，而所居地雖多，僻瘠以寧邑方輿計之，殆占二分之一焉」（王大魯 1967：166）。

由於方音差異，這些新人居者雖多與土著雜居，但土客之間的方

言界線十分明顯，如《赤溪縣志》即言，「客民因方言與土有別，又性堅毅，不苟隨人，彼此似難融化」（王大魯 1967：166），以及土客之間，因「彼此語言扞格，易失感情」，故「因方音不同，積年尋仇劇鬥」等（王大魯 1967：68），可以清楚了解土客之間，除了土地關係與經濟地位有差之外，方言的差異更是彼此界線分明的原因之一。

隨著遷入者人丁繁衍，及與土著的土地競爭關係，土客之間的摩擦與衝突愈見頻繁，科舉競爭的加劇也是土客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客民移居新地，必須面臨與本地人競爭科舉學額的困境。由於在鶴山、高平、開平、恩平等縣「占居者眾」，故在乾隆年間即「得與土民一同應考」，但新寧客民卻「屢請入籍與試，皆為土著所阻」，直至 1764 年（乾隆 29 年）客童廖洪等赴都察院具控，奉諭旨著廣東巡撫圖薩布查奏，經部議覆准後，才得以另編客籍考試（王大魯 1967：166）。³

由於對這群移入的客民不滿，表諸於方志中的土著觀點，也開始呈現負面的描述，如陽江，「僑寓多惠潮之人」，並指其「朋比為奸，挺而走險，枕近場竈，私販充斥，器用多資他郡，地力可以自給，以故無甚貧甚富之家，文物聲名未為盛也」（陳昌齊等 1968：1798-1799）。或如恩平，其客民乃惠、潮、嘉三府州之人，雍正年間流寓廣肇二屬各州縣，開墾住聚，自為村落，傭力營生，「土民奴隸視之」（陳坤 1959：400）。凡此，都反應了當時土客關係之不睦。

光緒《四會縣志》亦稱，「邑上路各舖多客民，土人稱之為客家，

3 日人片山剛從新寧的科舉報考問題分析當地廣府人和客家人的關係。認為清廷為移住的客家人設立畸零圖，並依此自立納糧戶，而不必依附在結構廣府人社會的圖甲制。且在科舉考試中制定「客籍學額」，以避免跟廣府人競爭有限的學額。然這兩項措施，卻使得客家移民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械鬥發生期間，一直保有自己的特徵，而沒有同化，成為制約客家人和廣府人之間關係的框架。參見施添福（2010）。

其來不知所自，雖習土著，而客家話久遠不改。初來時耕山移徙，亦類瑤，久乃與土著雜居平壤，相親相睦，彼此無猜，故歲科考不另編客籍學額。近三十年前仍有陸續來僑居者，或曰客，乃狃之訛」（陳志喆等 1967：編一·獠蛋·客民附）。該縣志直接把客民附在獠蛋一類，⁴顯現的也是土客間的緊張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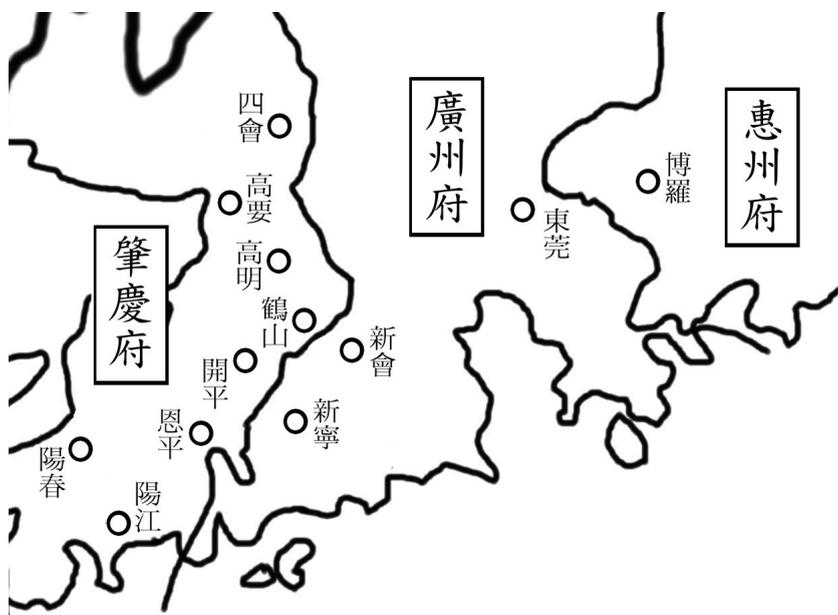


圖 5 咸同年間土客大械鬥相關區域

廣肇兩府的土客之間就因為上述之種種緊張關係，積嫌隙成宿怨，於是不同方言人群間的糾紛，逐漸由個別村落擴張為村與村、姓與姓的械鬥，甚至跨越了縣界（何國強 2002：115），終演成自 1854 年（咸豐 4 年）開始的開平、恩平、新寧等縣的土客「分聲械

4 光緒《四會縣志》，編一，獠蛋，客民附。

鬥」，土客雙方互鬥十餘年，蔓延五、六縣，死亡百餘萬。

此次土客械鬥緣於 1854 年（咸豐 4 年）的紅巾賊亂，地方官員募客勇防守，但客民在幫同地方官克復城池的同時，「因以積年仇恨土民之心，乘勢報復，肆意屠殺，致成械鬥巨案。土客交相擄殺，各至數十萬人」（郭嵩燾 1983：197-201）。土人則附賊者眾，聞剿懼之，「乃煽布謾言，謂客民挾官剷土」，一場「仇客分聲」（王大魯 1967：167）的分類械鬥於是展開，且隨即蔓延。由最開始的鶴山，進而開平，再因「煽動各縣土屬聯同逐客」，於是恩平、高明等縣隨之，「視凡說客話者皆引以為敵」，而鬥禍益烈（王大魯 1967：167）。由於省級官員因剿亂無及於此，地方官員則認為不過是地方私鬥而忽視之，並未派兵到地制止，導致鬥事積年莫解，蔓延日廣。到了咸豐 6 年，土客械鬥波及新寧，以及原本土客尚稱和睦的陽江、高要、陽春等縣，其中尤以新寧鬥禍最烈（王大魯 1967：168），在新寧西路更是「與鬥千百次，相持至十餘年」（王大魯 1967：167），直至 1867 年（同治 6 年），廣東巡撫蔣益澧議令土客聯合，另劃赤溪一廳，互易田地，紛爭始稍告解決（王大魯 1967：50-51）。

由械鬥期間的相關文獻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在當時廣、肇的客方言人群，普遍被土著稱為「客家」，如《新會圍城記》言，「客家身裹舊棉胎，雖熱不解，性很狠，見賊炮不避，直前斫賊，與吾軍焚瓦窯巢。居民亦多為客家所殺，鄉勇出入皆步行回營」（轉引自劉平 2003：101；重點是加上的）。以及《鶴山麥村麥氏族譜》中言，由於會匪勢力日益囂張，「四處著人往客家打單」，麥氏宗族害怕招惹禍端，「嚴禁子弟，不許跟隨客人打仗，只獨立門戶，洪、客俱不入黨」。其中麥村雖屬土村，但當地麥氏由於初期與客民友善，

卻反被土民視為「漢奸」（轉引自劉平 2003：65；重點是加上的）。

此外，處理這場土客械鬥的清朝官員也將與廣府系土著人相對的一方稱為「客家」，如龍啟瑞撰〈粵西團練輯略序〉中即言「外郡地多山場曠土，向招粵東**客家**佃種」（龍啟瑞 1995；重點是加上的），又如 1864 年（同治 3 年）11 月，粵督毛鴻賓奏稱，「溯查**客家**之初，本係惠潮嘉三屬無業之民寄居廣肇各郡，為土人傭工力作，數百年來孳息日眾，遂別謂之**客家**，而同里異籍，猜嫌易生，履霜堅冰，由來有漸」（毛鴻賓 1969：1485；重點是加上的）。該奏文言並言，戴梓潰等人係粵中著名巨慝，已竄擾楚粵之交數年，因見肇郡各屬客民與土人仇殺，乃率其黨「潛投客家」，為之畫策，「客匪之勢益大」（毛鴻賓 1969：1483）。

寫於 1920 年代，由客方言人立場所詮釋的《赤溪縣志》也表示，土著「以其來自異鄉，聲音一致，俱與土音不同」，故概以「客家」視之，遂謂之客家（王大魯 1967：165）。由以上事例可知，廣肇一帶客方言人群已被普遍稱為「客家」。

而由以下這則 1857 年（咸豐 7 年）華工獲救後的供詞，我們似乎可以推定，咸豐年間或更早之前，當地的客方言人群已以「客家」作為自稱：

朱先甲供：年四十一歲，廣東新寧縣人。我是客家，耕田為業，被本地人欺負，把我拿出賣與大西洋人，是澳門豬仔館，逼我畫合同，給我一套衣服。咸豐七年二月開船。（陳翰笙 1984：767）

由這些片斷地，來自土民、客民，甚至官員的論述內容，或許可以

如此推論，在這場咸同械鬥發生以前，「客家」一詞，可能由原本的「他稱」逐漸成為移墾當地的客方言人群的「自稱」。

相較於稍早發生於博羅、東莞的土客械鬥，有客籍士紳徐旭曾著〈豐湖雜誌〉而留下「客人論述」，約同時發生的廣西客民參與的太平天國，有傳教士韓山文著書說明移墾廣西的 Hakka 源流，且可知已對應至漢字的「客家」。而咸同年間這一場波及十餘縣，時間長達十餘年的土客大械鬥對客家的形塑有何影響？目前尚未見到當地有如徐旭曾的士人階層，以客人本位留下相關的「我群」論述，有此性質的《赤溪縣志》的完成已是民國以後的事。但由於這一場土客械鬥的規模太大，時間亦長，乃引起「中心客區」士子以及西方傳教士的關注，他們的相關論述，對華南客家的形塑有相當大的影響。

約於 1867 年（同治 6 年）間，大埔林達泉著〈客說〉（林達泉 1967：133-135），其目的在為當地的「客」抱不平，故言「奈何指客為匪」，「客與土鬥，客非與官仇」，何以「聽土人之誣捏」，而視客為叛逆，「竟助土人而驅之，滅之，必使無俾易種於斯土也」，也明確表明，為文是希望「以俟哀矜者之平其情，解其怨焉」。就其論述而言，主要的內容有：

(1) 認為客之名來自於土，即「客之對為主人。主人者，土人也」，二者的差別在於移墾的時間先後，「土籍於先，客籍於後」，移墾時間的先後也導致二者間經濟地位的差別，「先則擇肥而棄瘠，後則取其所棄而已足，無暇於擇」，故客「男女皆耕織，無敢自惰」。

(2) 強調方言是客家的主要特色，因此特色，客家成為一個跨數省的人群代稱，故言「楚南江、閩、粵、滇、黔之間，聚族而居，有所謂客家

者」，「其稱客，越疆無殊，其為語，易地如一」，並認為就是因為這一群外移客民一直固守我群之方言，「客於縣而他縣之客同此音也，客於府而他府之客同此音也，於道於省無不如此」，於是這些外移的客民移墾之處，皆被稱為「客」，「是稱客無殊，其音即無異也」（林達泉 1967：132）。

(3) 嘗試從文獻史冊中為客溯源，故言「間嘗按之史冊，詳為稽核，客之源流，殆託始於漢季，盛於東晉六朝，而極以南宋」，此論說之證據，林達泉認為是由於「客之先皆北產也」，即客為北方南遷之漢族，南遷的原因則是由於東晉元嘉五胡亂華，客人乃「挈家渡江，匡扶王室」，藉此也強調客人之忠義精神。

(4) 強調客之語言多合中原之音韻，如言「即與部頒之韻不相逕庭，蓋官韻為歷代之元音，客音為先民之逸韻，故自吻合無間，其有間則雜於土風耳，非其朔也」（林達泉 1967：132）。

由以上的內容可知，林達泉在為廣、肇府客民的遭遇「感同身受」的同時，完成了一個跨省的「客家論述」。雖然通篇稱「客家」者無多，但無礙其正面表述「客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林達泉原籍大埔，當時潮州府的大埔、豐順與嘉應州客區成連片分布，故可視為「中心客區」之士紳，故其〈客說〉與徐旭曾〈豐湖雜記〉不同之處在於，徐旭曾是「邊緣客域」的在地客人的自我認同，而林達泉則是「中心客區」同情作用下的方言認同。他這一篇以「中心客區」視角所完成的「客家論述」顯示，「客家」已是「邊緣客域」乃至「中心客區」的客方言人群都能接受的「自稱」，就華南

客家的形塑歷程來看，其影響至關重大。

相關於徐旭曾〈豐湖雜記〉因收錄於族譜中，能見者應相當有限，可能引發的效應可能僅限於聽其講授內容的門生或鄰里故舊。林達泉〈客說〉於1925年由溫廷敬輯入《茶陽三家文鈔》，但在此之前可能已在「中心客區」中流傳，如1898年（光緒24年）的《嘉應州志》即引「大埔林太僕達泉著客說，謂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其說皆有所考據」（吳宗焯、溫仲和1968：121-122）。以及1921年出版《粵省民族考原》的鍾獨佛也自陳，「余自前清少時，即讀大埔林海巖先生客說，如為咸同間西江土客相鬥而作，因悉客之所由稱」（鍾用蘇1921：23）。由此可知，林達泉〈客說〉對「中心客區」的知識階層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些影響也反映在日後諸多的「客家論述」中，多自林達泉的論述內容說起，如《赤溪縣志》（王大魯1967：51、165）、〈漢族客福史〉（鄒魯、張煊1933：9、14、16-17）等，1907年學部在審查黃節著《廣東鄉土歷史》教科書時，也引大埔林達泉〈客說〉，謂「客家多中原衣冠遺種云云，可見由河遷福，由福遷粵，皆中原漢種。原書橫作武斷之詞，其誤三也」（不著撰人1907a）。到了1930年代，仍是認為「言客族源流者，以前輩大埔林太僕之說為最先，最確」（不著撰人1933：133）。

綜而言之，林達泉因應發生於廣、肇府中的土客大械鬥所寫的〈客說〉，成為客家認知由「邊緣客域」回流「中心客區」的重要關鍵，對於華南客家形塑的歷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而另一個讓「中心客區」接受來自「邊緣客域」客家稱謂的重要關鍵，則是當時西方傳教士為Hakka溯源的相關論述。

咸同年間的土客大衝突，除了使得身處「中心客區」的林達泉著〈客說〉外，也讓當時在廣東一帶以客方言人群為傳教對象的巴色會傳

教士也投入為客家溯源的行列。就在土客械鬥仍在持續期間，巴色會傳教士 Ernest J. Eitel 於 1863 年，已為文撰寫所謂的客家文學（Hakka Literature）——山歌。持續 12 年的土客分聲械鬥結束的 1867 年，Eitel 開始於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中日釋疑》），分 6 期連載“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客家人種誌略），其主要內容「首先作出客家、福老和本地之區分；繼而提及本地人與滿洲人居住的區域；其後詳論客家人的特徵、風俗、習慣、歌謠、宗教概況」。對當時廣東三個方言人群的分布有清楚的說明（湯錦台 2010）。

值得注意的是，Eitel 在文中開宗明義表明「The word Hakka, 客家, means “strangers” or “foreigners.”」（Eitel 1867: 65），將西文的“Hakka”與中文的「客家」同時並列刊出，可知此二名詞的內涵趨近一致，至少就當時西方人的認知而言。

1873 年，Eitel 又在《中國評論》上發表“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s”（客家歷史綱要），指出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沒有歷史學家曾經提及過 Hakkas，甚至在客家人的文學創作中也沒有關於這個種族以往歷史的任何記載，故表示他為文的目的是在於「為這個非凡的種族編寫一部早期簡史」（Eitel 1873: 160）。由於缺乏歷史文獻，Eitel 從族譜及口頭傳說，建構了一幅清楚的客家源流圖像。主張客家南遷「五波說」（Eitel 1873: 160-162）。

值得注意的是，Eitel 於 1862 年抵達香港，即至寶安布吉附近的客家聚落李朗工作，1865 年由巴色會改隸倫敦傳教會，並被派往博羅，專事客家教務（譚樹林 2010：182）。其所傳教之地域基本上是與廣府人交錯的客家地域，即其論說的主體是土客衝突中的「邊緣客域」。溯源時，除從族譜中建構遙遠久古的世系外，也提到他們主要是從嘉應州

一帶南移者，約於 1780 年大量湧進廣東西部及西南部，集中在番禺、鶴山、新寧一帶（譚樹林 2010：178-193）。並稱讚該種族優秀的特質，如言 Hakka 「猶如牛奶中的奶酪」。

接續 Eitel 之後，另一位巴色會傳教士 Charles Piton 也同樣關注客家源流及相關問題。Piton 於 1864 年抵達香港後，立即被派往廣東嘉應等客家地區傳教，長達 7 年之久。曾撰有 “The Hai-Kah in Chekiang Province and the Hakka in Kwantung Province”（浙江省和廣東省的客家）、“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客家源流與歷史）諸文。Piton 認為，根據族譜可知，客家祖先原居於福建寧化石壁村，唐末時因黃巢之亂開始南遷，嘉應州轄區及大埔、永安、龍川是客家集聚區；豐順、揭陽、歸善、博羅也有大量的 Hakkas，一部遷往鄰近的廣西。Piton 認為 Hakkas 是「漢族的真正子孫」，也主張客方言與漢族方言極為相似。Piton 本身雖然也以族譜為論述依據之一，但表示盡信族譜資料是危險的，因為其中不乏為抬高身價而捏造的成分。而針對 Eitel 將客家人描繪成一個充滿好動特性的流浪族群也進行了反駁。Piton 表示，以長樂、興寧、嘉應等地的客家人為例，可以證明這種說法並不正確，並表示「如果 Eitel 有機會到這些地區看看，他將糾正自己關於客家人的許多觀念」（轉引自譚樹林 2010：183-185）。

值得注意的是，Eitel 看土客關係的觀察點是散居於廣府地域的「邊緣客域」，而 Piton 傳教的重心已至客方言中心區域的嘉應州一帶。二者客家論述的差異點在於：(1) Eitel 關注的客域是廣府周遭的客方言人群，Piton 提到的客域則是以嘉應州為中心的客方言區；(2) 位處「邊緣客域」的 Eitel 在客家溯源時，將客家居地由邊陲拉回與嘉應州之間的關係，Piton 則以族譜資料拉起嘉應州與汀州寧化之關係；(3) Eitel 看到的是流徙甫定的客域，故認為他們有流浪的天性，但 Piton 看到的則是

在地化已久，穩定的「中心客區」，故認為 Eitel 將客家人描繪成一個充滿好動特性的流浪族群是有誤的。凡此種種不同的觀點，主要應是由於二者所處地域不同，接觸的客方言人群不同，故觀察到的「客家像」也因此呈現差異，也就是二人視角下「邊緣」與「中心」的差異。

自韓山文開始，巴色會傳教士們以客方言人群為傳教對象的同時，也一同參與了華南客家的形塑歷程，因為宗教的連繫，讓韓山文得以有機會從洪仁玕口中了解 Hakka 在太平天國中的角色，以及這一群遷徙廣西的 Hakka 他們來自何處，有何祖源。之後，Eitel 與 Piton 則接續在傳教的同時，致力為客家溯源，隨著他們傳教位置的移動，也可能逐步發揮其 Hakka 論說的影響力，與林達泉的〈客說〉一樣，成為「Hakka、客家」回流中心客區的重要推力，逐漸讓「中心客區」接受以「客」為名，共同參與下一階段的客家形塑歷程。

由以上文獻可知，說客話的人以「客家」自稱，其實早於西人對 Hakka 的溯源與美化，或許即因為西人在定名之前，華南一帶已有說客話者自稱為「客家」，才讓西人採此拼音作為這個方言人群的專稱。而施添福所謂的「西歐的傳教士依據方言主義所鑄造的『Hakka 客家』標記」，則為日後「中心客區」自我定位為「客家」，提供相當充足的認同質素。即因為西方傳教士為客家的溯源，因此到了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廣東境內的許多地方，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而更特別的是，原本是「土著」、「主人」、「本地人」的嘉應州人或潮州大埔和豐順人，也自稱是客家，並屢次為客家的污名化群起抗爭（施添福 2011:7）。

四、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

以往的研究已注意到，在客家形塑過程中，由於成片純客的中心地域裡，客方言人群已在本地化為土著，不再有自以為「客」的概念，因此沒必要以「客家」自稱。只是後來因為外遷入粵中、粵西以後，由土著變成客民，在當地居民的比較中現出不同，也才有「客」的意識和「客家」的稱謂。然後，「客家」自稱逐漸往客家基地回流、反饋（胡希張等 1997：108-109）。但對於「中心客區」為何接受來自「邊緣客域」的「客家」稱謂，以及如何以「客家」自我定位的過程卻乏有人加以探討。前一個論題已如上所述，以下則主要說明「中心客區」由接受「客家」稱謂，到以「客家」自居的過程，及其可能的原因。

（一）從無到有——「中心客區」的客家論述

唐立宗就清代廣東地方文獻的耙梳了解，認為在 1898 年（光緒 24 年）《嘉應州志》出版前，粵東地區的志書中，尚未出現以「客家」立場的書寫，到了《嘉應州志》，客家文化才被比較直接且正面地表述，換言之，「中心客區」的「客家」意識直到 19 世紀末才形成出想像的實體概念（唐立宗 2005：104-105）。緣於此，我們或可由「中心客區」的相關志書來了解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1880 年（光緒 6 年）廣東鎮平人黃釗著《石窟一徵》可視為一本《鎮平縣志》，或許就是基於一種為鄉土修志的使命感使然，黃釗在書中對鎮平一帶的地理環境、源流、教育、信仰、禮俗、歲時制度、語言等均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比較特別的是，在全書共九卷的內容中，特闢八、九二卷專述方言，顯示黃釗認知到鎮平方言之特色，且有一定的認同感。而這二卷方言的記載，對鎮平一帶客方言的紀錄與保存貢獻不小，

因此有論著言「客語之有成書，實自此始」（曾運乾、朱希祖 1933：22）。但在二卷的方言記載中，僅是單純的記音解釋，並無將之與某一人群的認同意識相連結，也沒有將該方言冠以「客」的名稱。後來修纂《嘉應州志》的溫仲和曾表示，黃釗《石窟一徵》「其旨不以古音為主」（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4），藉此可進一步了解《石窟一徵》開列〈方言〉篇，其實並無意強調客家源流，或方言與中原古音間的關係。

該書除兩卷的方言外，另一個最常被用來闡釋客家源流的是卷一〈征撫〉中，關於客戶增盛的說法。書中提到：

邑無北宋以前土著，或疑當日草萊未闢。……南宋後疊遭兵燹，土著逃亡僅存一二，而遺黎彫敝，轉徙他鄉，歷元而明，中原衣冠世族始稍稍遷至。……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戶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可見元祐以前客戶增盛，至元史地理志載，梅州戶僅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五，所耗可勝計哉。（黃釗 1970：22-25）

由書中論述脈絡來看，黃釗的用意只在論述宋末之後梅州戶口增盛之情形，雖然提到南移的是「中原衣冠世族」，但在敘述上主、客戶並論，並無特別強調「客戶」，或「客戶」與某一方言人群的關係。

有論者已經注意到，黃釗在《石窟一徵》裡雖然提到宋代梅州客戶增盛，也提到臺灣的「閩之漳、泉人」及「粵民」，但全書中並未提到「客家」二字，也沒有以「客」為我群名稱的說法。換言之，回歸《石窟一徵》的文本，黃釗編纂此書用意主要強調本邑的風土文化，尚未有強調「客家」歷史文化的目的（唐立宗 2005：96）。

相較來看，1898年（光緒24年）《嘉應州志》的出版，則明顯是客家士子利用官方史志，建立起自己認同的文化和歷史陳述的一個典範。在光緒《嘉應州志》之前，嘉應州已有乾隆朝修的志書，但該志書的重心仍以蘇軾、韓愈在潮州所作的文化貢獻來論證本地文化，及強調嘉應州與潮州府的關係（程美寶 2006：74-75）。然而，十分明顯地，到了光緒《嘉應州志》，其所敘述的地方文化，已轉為以客方言人群為主體了。

與「邊緣客區」的客方言人群及西洋傳教士相較，作為外遷移民原居地的嘉應州，開始思索「客」意識之歷史更短。而且，嘉應州人並非由來已久的群體，嘉應州在1733年（雍正11年）始由潮州府分出，自成獨立行政區，在此之前，應仍是以潮人自我定位，而這個潮人的意涵，含括了客方言與閩南方言。

若我們將各方志的時間稍作定位，乾隆朝《嘉應州志》未言及客或客家，林達泉〈客說〉著於同治初年，咸同年間為 Hakka 溯源的巴色會傳教士逐漸深入中心客區傳教，但1880年（光緒6年）的《石窟一徵》仍未言及客或客家，到了1898年（光緒24年）才見以客家自我定位。這樣一個脈絡，顯示「中心客區」接受以「客」自稱極有可能是受到林達泉〈客說〉與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但接受的時間，已是接近滿清王朝將要結束的年代。

溫仲和在《嘉應州志》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敘述客話源流及在當地流行的情況，並於卷末言「舊書志無方言，此篇為特創，前無所因。為述所以編之意，俾覽之者，知客話源流之所自焉」（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4）。在該書〈方言〉卷中，溫仲和也標示出客話的整體界境：

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

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由以上各州縣人遷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兩廣為最多。土著皆以客稱之，以其皆客話也。（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1-122；重點是加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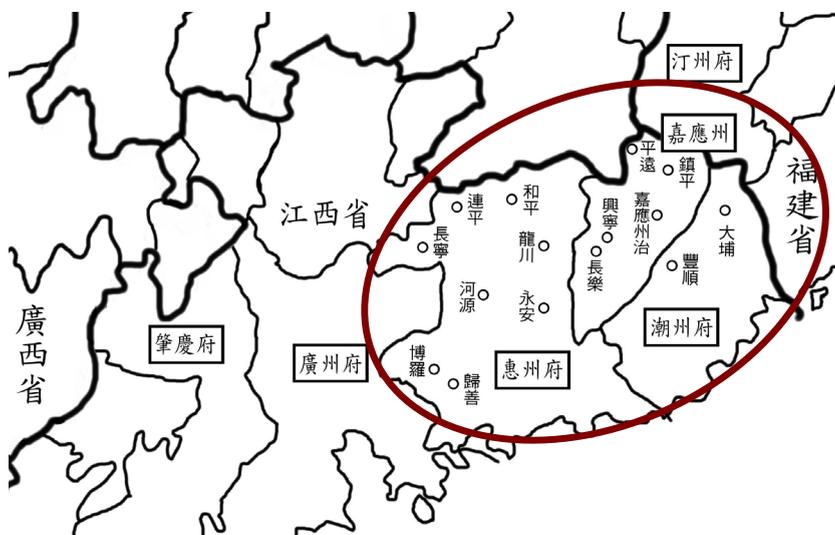


圖 6 《嘉應州志》中之客方言分布區

以上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一，確定了客方言人群的分布區域，卻未及於外移的「邊緣客域」。溫仲和對於客方言的分布，不同於徐旭曾、林達泉等人的視角，《嘉應州志》呈現的是以嘉應州治為中心，向外擴展的客域，即以嘉應州全境為主，兼及潮州府的大埔、豐順二縣，及惠州府的永安等八縣。長寧、博羅等地的納入，顯示當時這些地域已

逐漸轉變為以客方言人群為多數的行政區域。但溫仲和所畫出的「客域」，卻未及移墾廣、肇兩府及廣西省的客方言人群。

其二，由所言「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可知，溫仲和將原本發生於「邊緣客域」的「客家」稱謂，也用來指稱是廣府人對「中心客區」說客話人之他稱，這個太過跳躍式的論述不免讓嘉應州民究係土著，抑或客民，陷入難以自辯的困境。因為該文也稱嘉應州民是「今之土著」（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2）。無怪乎清末民初的徐珂曾表示，「然嘉應人在其本州所操之語，粵人謂為客家話，蓋亦非嘉應土著也」（徐珂 1966：〈客族〉條）。即如施添福所言，溫仲和在《嘉應州志》將客家與客話視為是廣州人對嘉惠潮等地區客方言人群的他稱，但是為什麼廣州人將客家基本住地的土著也稱為客家，卻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施添福 2011：25）。

由以上《嘉應州志》的「客家論述」內容，我們不難看出，源於「邊緣客域」的客家意識已回流至「中心客區」，於是這個可能早已「反客為主」，在地化已久的「中心客區」如何自我定位為「客」，是一個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前述《嘉應州志》的「客家論述」，或可視為這個「中心客區」正自我詮釋為「客家」稱謂之源出地。但溫仲和顯然也覺得僅以「廣州人的他稱」來自我定位為「客家」源出地的理由不夠充分，因此就採借了黃釗《石窟一徵》有關宋代「客戶」增盛的說法。於是，溫仲和提到：

故今之土著，多來自元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自來，大抵多由汀州之甯化，其間亦有由贛州來者，其言語聲音，皆與汀贛為近，其傳次亦相上下約在二十餘世之間。
……今所謂土著，既多由汀贛而來，其言語聲音又與相近，

主客之名，疑始於宋初戶口冊，故寰宇記九域志所載戶皆分主客，而唐元和郡縣志載，開元元和之戶皆無主客之分，其後屢經喪亂，主愈弱客愈強，至於元初，大抵無慮皆客。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特不知當時所謂主者，其土音有異於客否，而今則皆客話，人亦概視之為客家，並無所謂主矣。（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1-122）

不難想像，當時主纂《嘉應州志》的溫仲和正在思索如何詮釋以「客」自我定位，宋代客戶增盛說恰與中原漢人南移的時間吻合，而「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又巧妙地被解釋成「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黃釗的「無心插柳」，竟讓溫仲和找到梅州作為「客家」發源地的靈感，而這個說法日後也為羅香林所承繼發揮，這可能是黃釗始料未及之事。

除了以宋代文獻中的梅州「客戶」證明嘉應州為客家之源外，溫仲和也強調在地居民多由汀贛而來，篇末並引林達泉所言，論證「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或避漢末之亂，或隨東晉南宋渡江而來，凡膏腴之地，先為土著占據，故客家所居地，多瘠瘠，其語言多合中原之音韻」（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2）。於是，「客家」之由來被轉換場域，以徵引宋元文獻的方式，在「中心客區」重新完成一套自己是「客家」稱謂源起的中心，就這樣，「客家意識」完成了由「邊緣客域」回流至「中心客區」的過程。但是，「中心客區」為了合理化自己為「客家」中心及發源地，卻在借引土客之爭後衍生的「客家」之名的同時，將「邊緣客域」排除在所勾勒的客方言分布區之外。

而此後的客家論述也多由「中心客區」發聲，當地的客家知識分子

陸續發表相關論述。如 1901 年（光緒 27 年），嘉應州梅縣人黃遵憲序張煜南刻《梅水詩傳》，亦嘗略論客家及客語的源流：

嘉應一州，占籍者十之九為客人，此客人者，來自河洛，由閩入粵，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余嘗以為客人者，中原之舊族，三代之遺民，蓋考之於語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誣也。（黃遵憲 1973）

其所呈現的內容，同樣以嘉應州為本位，論述客人係「中原之舊族，三代之遺民」，方言亦為「中原音韻」。但由黃遵憲的論述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心客區的客方言士子，與徐旭曾一般，比較習慣自稱為客人，而少自稱為「客家」。

同樣是 1901 年（光緒 27 年）修之《興寧縣鄉土志》〈人類〉篇，也是一篇極具客家意識的論述：

邑中人類，本中原衣冠舊族。宋南渡時，播遷轉徙，多由閩贛而來，語言風俗與土著異，故當時土著稱為客家。厥後由縣轉徙他方者，遂自稱客家，而并無改其語言風俗，示不忘本也。考據家謂其語言多存古音，風俗猶有古禮焉。（羅獻修 2011：85）

文中「當時土著」指的是原居興寧的原住民族，或如《嘉應州志》一樣指的是廣府人系尚難確定，但強調興寧也是「客家」源起之地的觀點仍十分清楚，於是「厥後由縣轉徙他方者，遂自稱客家」。此外，文中也將客家源流作詳細的交代，及標榜客家語言「多存古音」。

（二）「中心客區」以客自我定位的時空環境

中心客區會選擇接受來自「邊緣客域」的客家稱謂，並自我詮釋為客家，除了林達泉〈客說〉及西方傳教士為 Hakka 的溯源之外，應也與他們身處的時空環境有相當大的關係。在空間上，與處於韓江下游操閩南方言的人群密切互動的空間體系，在時間上，則處於清末民初的時代變局之中，這些可能都或多或少影響「中心客區」接受已有完整族源論述及中原方音的「客家」稱謂，而這個時空環境也進一步豐富了之後的客家論述。

1860 年代末期，汕頭開港後，逐漸成為韓江流域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潮州和嘉應州的許多文人，不管是講什麼方言的，都集中到此地活動，許多人也就在這個城市定居下來。他們在此地辦學堂、出報刊、編撰書籍，讓不同方言人群必須在此互動磨合（陳春聲 2005：51-52）。如陳春聲所言，近代城市的興起以及城市日常生活接觸中引發的族群隔閡問題，是具有近代色彩的客家族群理念得以強化和普及的另一個重要原素。汕頭市的興起，在韓江流域民眾「客家」理念形塑的過程中起了相當程度的作用（陳春聲 2005：51-52）。

1903 年（光緒 29 年），溫廷敬在《嶺東日報》以「訥菴」為筆名，連續刊載〈潮嘉地理大勢論〉一文。該文分氣候、地勢、山脈、河流、海線和民族六個部分敘述潮州府和嘉應州的地理大勢，其有關「民族」中，對「客族」有清楚的詮釋（轉引自陳春聲 2005：55）。陳春聲認為，這是目前所見韓江流域的講客家話的人群中，較早以近代「民族」概念和進化論觀點，系統地闡述自己族群的地位的文字（陳春聲 2005：55-56）。其論述值得注意的是：

(1) 對韓江流域的土客分布有清楚說明，即土族分布於澄海、普寧、海

陽、潮陽、揭陽、惠來等縣，其中海、潮、揭、惠山谷之間，頗有客族錯處；客族則以嘉應全屬與大埔為主，其中大埔內有少部分「福建來者」，而饒平、豐順，則土、客相半。

(2) 溫廷敬所論述的土客與廣東西路及廣西一帶的土客意涵不同，「客」相對的「土」不是指廣府人，而是指操閩南語的潮州福老。

(3) 表明客家與福老皆為中原之後，時南遷時間不同，「土族先至，客族後至」，也因此有地域之別，故一居沿海，一居山谷。

(4) 因所處環境不同，故土客二者風習民俗所有差異，土族「活潑進取」，「近於浮華」，客族則「質樸忍耐」，「流於固陋」。

溫廷敬本文的主要用意，在於希望土客二族和平共處，不應「已別於中原，又不能合於省會」。故可知溫廷敬所呈現的「客人論述」，是一個「中心客區」土人往潮汕一帶發展，在以福老人為優勢的城市地帶，不得不以柔軟姿態，將福老共同納入祖溯中原的行列中而產生的「客福」並稱的「客人論述」。

1907年（光緒33年），黃節編寫之《廣東鄉土歷史》由上海國學保存會出版，其中一課誤據上海徐家匯教堂所編《中國地輿志》，謂「廣東種族有曰客家福佬二族，非粵種，亦非漢種」，⁵此說一出，立刻引發客家學者大為不滿，並起而聯絡組織與著述抗議（唐立宗 2002：

5 羅香林曾表示，黃節著《鄉土史》時，「當不至存有若何不良目的，然以其書為普通教科所用，故深為當時客家人士所不滿，今則大家已『釋然矣』」。又據曾任檳榔嶼領事館之黃某曾表示，其在北京大學研究時，與黃節常見面，「彼曾於言談中，深悔少年著作之不檢」（不著撰人 1936：15）。

104)。溫廷敬首先在《嶺東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廣東鄉土歷史客家福老非漢種辨〉的論說文章，對黃節的說法提出抗議（程美寶 2006：82）。

同年 4 月，惠州府、潮州府、嘉應州、南雄州、韶州府、連州府等六屬學會認為，若該書版權不撤，終難禁其流傳，故開會集議務令撤銷版權，禁止售賣，以杜後患。⁶ 8 月，則有大埔縣勸學所總董廩貢生饒熙等向學部稟稱，《廣東鄉土歷史教科書》以客家福老為非漢族的說法「荒謬無稽」，該省法政學部曾以該書宣講，致釀事端，亦呈請將原書版權撤銷。學部則認為其所稟各節與之前審查時批令改正的內容略同，故札飭上海道飭令亟行改正，其原書應即禁止發行（不著撰人 1907c）。

除了向官府表達意見之外，客家人士也開始進行組織形態的串連。如南、韶、連、惠、潮、嘉各屬客人合設「客家源流研究會」，嘉應勸學所發起「客族源流調查會」，並發傳單遍告各地客人，呼籲多為論說，以彰顯客家源流，主其事者有丘逢甲、黃遵憲、鍾用蘇等人。以鄒魯為首正在廣州積極投身革命的客籍人士也積極參與，力證客家確屬漢種無疑（程美寶 2006：86）。

持續的輿論和組織力量，迫使上海國學保存會除刊登更正與停售啟事外，翌年再版時，已將圖表中有關客家的部分全部刪去，以避開這個敏感的話題（程美寶 2006：87）。有論者言，客家士子在此次《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論爭中取得勝利，不僅表現出客家士子已建立起強烈

6 所議辦法錄下（一）先由惠潮嘉南韶連六屬學會聯稟提學司請禁止書局售賣學堂購用，併嚴究著作者；（二）俟提學司批准後，一面電稟學部，一面黏抄提學司批詞續行郵稟請札行上海道撤銷該書局版權，因該書在上海某局出版，欲其一律註銷，必須學部方有特權；（三）應請惠潮嘉南韶連六屬各勸學所總董各蓋鈐記，務於三星期內寄交代表人，以便聯稟學部；（四）俟提學司批准後，即將原稟批詞排印數千張，分佈各屬學堂及寄登各日報。參見不著撰人（1907b）。

的族群認同意識，也逐漸顯現出他們在廣東政治社會的實力（程美寶 2006：95、251）。

因應黃節事件，鄒魯除「聯全粵客福所隸數十縣勸學所，與之辯正，并止其出版」之外，並多方搜集材料，編成〈漢族客福史〉草稿，然因當時為進行反清行動，惟恐散失，乃囑張君煊終其事。宣統2年（1910）由南洋同人集資印發（鄒魯、張煊 1933：17）。在該文中，鄒魯立論內容與前述溫廷敬的「客福」論述頗為相近，皆以福客共為主體，表達希望與福老共同抵禦外侮之立場。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針對黃節事件，福老方面的反應平平，而客家士子積極欲結合福老的動作，可能也某種程度地反應了他們在汕頭這個以福老為優勢的城市裡，柔軟而示好的姿態。

另外一篇論及客族源流的著作也頗值留意，即為鍾用穌（即鍾獨佛）所著之《粵省民族考原》。本書出於舊作〈土客源流考〉，曾刊於所著《卷密精盧故言》，1915年補充舊著成〈客族考源〉，1921年再以《粵省民族考原》成書出版。

鍾用穌在《粵省民族考原》中提到「粵省客族」時，視野較前人擴大，不以粵境自限，故言「以同一語音而達四百萬衆，蓋統東西北三江而言，不特粵也。江西之贛州，福建之汀州，以及中部北部諸省，操此客音者，亦所在多有」（鍾用穌 1921：15-16）。對於「客」之名源於宋代梅州客戶增盛的說法，鍾用穌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質問，即若梅州獨占「客」名之發源，則其他地區「同語之先民」應如何自我定位為「客」（鍾用穌 1921：18-19）。但對這個疑惑，鍾用穌自己給了這個答案：

故謂客家之稱始於宋，因被諸同語之先民，恰與福老之稱始

於唐，被諸閩越之先民同，亦自持之有故。（鍾用蘇 1921：19）

鍾用蘇對「客」出自於梅州的解釋，其實略嫌單薄，只言「故謂客家之稱始於宋，因被諸同語之先民，恰與福老之稱始於唐，被諸閩越之先民同」，卻未多加解釋在山川險阻，交通不便的當時，這個同語群人的稱謂，如何進行「被諸」的過程。

綜上可知，「中心客區」在接受了「客家」稱謂之後，亟思如何解釋梅州為「客家」之源起，此外，「中心客區」的「客家」論述，其內涵與對稱也與「邊緣客域」大相逕庭，不再針對廣方言人群，而是針對與他們在歷史淵源在接近，且同屬韓江流域的潮汕福老人。

五、客家意識的散播

民國成立之後，以嘉應州及鄰近地域為主的「中心客區」已確立其為「客家」之源起地，而「客家意識」也逐漸成為「中心客區」與遷移或離鄉背景的客方言人群的重要連繫。此後，經由一次又一次的受辱事件激發認同，再一次又一次地將「客家意識」向外發揚，甚至傳揚至海外，並進一步成為海外客屬號召團結的重要標誌。

（一）離散又團結的客家

「中心客區」確立其為「客家」之源起地之後，向外離散的客家也開始以「客」為名作為聯繫同方言人群的紐帶。如 1919 年，在《申報》一則〈粵人力爭電車合同之公電〉中，我們看到了聯名的九個團體中，除了嘉應五屬同鄉會、潮州會館等外，亦見「旅滬廣東客語同聲會」（不

著撰人 1919a、1919b），可見離散上海的客方言人群開始接受以「客」自我定位，並藉之團結同語群之人。

192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西人烏爾葛德主編的世界地理課本，該書在廣東省的敘述中，有「山地多野蠻部落，如客家等是」之句，引起離散在外的客方言人群不滿。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客籍人士分別組織「客家大同會」，向商務印書館提出立予更正之要求。汕頭也有專門宣揚客家文化的《大同日報》出版。⁷

1921年廣州的客家各屬代表召開會議，席上饒芙裳說明客家民族的由來，攻擊所受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宋文炳 1940：343）。上海的客屬同鄉也於同年1月在華僑聯合會召開客家大會，討論對付烏爾葛德及商務印書館的辦法，並推舉代表向商務印書館交涉（羅香林 1992：7）。廣州大同會另於1921年9月，派饒芙裳、姚雨平、黃鍊百等人，至香港與當地客屬人士共同召開旅港客屬代表大會，會中除了決議「響應北京、上海、廣州三處客屬大同會，向商務印書館嚴重交涉」外，並決議支持李瑞琴組織「崇正工商總會」之提議，以「崇正黜邪」為宗旨，「俾同系人士，得聚集一堂」，而此會之所以不冠以「客家」二字，則是因為「因吾人堅忍耐勞，賦有獨立之性質，所習又不與人同化，故土客之間，情感不無隔闕。吾人雅不欲以四萬萬五千之中華民族，各分畛域」（乙堂（羅香林）1950：2-3）。

這場《世界地理課本》風波，最終由該書館聲明錯誤，並通函各地學校立予更正，未賣清的餘書停止發行。一場風潮，始告平息（羅香林 1992：7）。事後上海的嘉應學生會曾將該案經過寫成報告，

7 「汕頭大同日報創始於民國十年，然不及週年，以即款絀停辦，當時主持其事的，為梅人周輝甫」羅香林(1992:7)。

並撰述各種關於客家歷史語言的文章，發表於所編《嘉應雜誌》中。至於上海的客系大同會，則因有留日客籍學生會認為若客人因此而組織特殊團體，取異於人，未免「示人不廣」，且「當此國步多艱，強鄰環伺，內政外交，措施正難」之際，實不應互相排斥，故主張取消客系大同會，以學術研究會代之，並將大同會募得款項，移辦公益事業（羅香林 1992：7）。

而因此風波在香港成立的「工商崇正總會」則對日後客家形塑影響深遠。此會之成立，除了因應《世界地理課本》的污衊事件外，主要的原因也在於「我客屬人士，僑居香港，以無統屬團體，常遭意外歧視」，故「知非團結群力，振奮精神，不足以適應環境，奔走呼號，結集同志，以創立團體」（陳承寬 1950：3）。該會章程第三條中明示：「本會以聯絡國內各地，及海外各埠，同系人士，交換智識，振興工商事業，興辦學校，共謀公益，考證源流，互助同人為宗旨」（乙堂（羅香林） 1950：20）。可見該會欲作為海外內各埠之連繫地位，及欲考證客家源流之主要用意。

香港工商崇正總會於 1921 年成立之後，即積極編纂同人系譜。推賴際熙為編纂主任，以李佐夫等協助纂述。先由賴際熙分函國內外有關人士，徵求同人族譜等相關資料，認為「其最切要者，在於源流一門，以能追索我同人世系源流，即可共悉我同聲者為神明華胄」（轉引自乙堂（羅香林） 1950：6），直至 1924 年冬，始正式撰書，1925 年季秋，脫稿付印，成書 15 卷（乙堂（羅香林） 1950：6）。凡例中明白表示，「此編專為同人表揚世德，聯絡氣誼而作」，「以本會同人為範圍，其不在本會同人之列者，則恕不登載」。全譜分源流、氏族、禮俗、語言、人物、選舉、藝文、雜著等八類（香港崇正總會 1950）。

此書雖名為《崇正同人系譜》，以類似方志的體例，記載廣東客家人的風俗、語言、宗族、藝文、選舉、人物等等。然其與方志最大的分別在於，論述的主體跨越地域，顯示客家族群的身分認同和廣東其他族群頗有分別（程美寶 2006）。

該系譜再次以宋元文獻確認客之名緣於梅州之主客戶。「此為中世時期之客族。而客之名稱，亦至宋初太平興國年間始著明文於載籍」。特別的是，其中說明「客戶二字是官書藉以區分序列，非民族用以辨別主從也」，並言「試觀今日贛閩粵三省毗連之地，言語皆同，可見是即最初一次之客而未經再次之客也」。其論述內容主要的重點有：

- (1) 確認客族係宋末元初及元明之間由汀贛二州源源而至，並言「此為後客」，「宋以前為先客，且完全為客戶，而無所謂土戶也」。
- (2) 對於客域的論述更為全面。除梅州外，亦言及惠州、潮州、廣州府屬與廣西，及海南之客家，其「所祖皆由宋南渡，再從贛汀轉徙而陸續來者」。

綜上可知，在同人系譜的客家論述中，對於客家的範圍除中心亦含括邊陲，這可能與主纂者賴際熙曾經編纂《赤溪縣志》與《增城縣志》，對廣、肇二府土客關係了解甚深之緣故。

1925年12月，香港工商崇正總會因應會中成員建議，認為原本的組織名稱帶有「工商」二字，未免範圍太狹，因此至1926年6月，透過召開會議的方式決議更改會名，單稱「崇正總會」（乙堂（羅香林）1950：6）。崇正總會的成立對海外客屬的連繫，以及客家

意識向海外推展的影響甚大。

若我們從清代同光年間一些走訪海外的見聞可知，多已注意到外移者幾為閩廣之人：

表 1 同光年間海外遊記中對華人的描述

西貢	同治 05/02	閩、廣人居此貿易者聞有五六萬人。土人用漢文，郡縣名與華同。	斌椿，〈乘槎筆記〉
	光緒 10/03	華人之流寓於此者，皆粵、閩籍，合六省之地計之數有四十餘萬。	袁祖志，〈瀛海采問紀實〉
	光緒 12/02	吾華之寄寓，大都皆閩、廣人，至長子孫而衣冠風俗皆守舊。	鄒代鈞，〈西征紀程〉
新加坡	光緒 02/10/28	華人則不下十萬（廣東五大縣及新寧人共二三萬，潮、嘉等屬共五六萬，其餘則閩產）。	劉錫鴻，〈英軺日記〉
	光緒 02/10/29	新加坡約二十萬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萬，餘皆閩、廣人也，而粵人較多。據胡璇澤云，廣屬人已至七萬之多。	郭嵩燾，〈使西紀程〉
	光緒 04/11/12	其地華人約十萬人，閩人居其七，粵人居其三。	曾紀澤，〈使西日記〉
	光緒 10/03/03	所有華人約十萬，閩人居七，粵人居三。	蔡鈞，〈出洋瑣記〉
	光緒 12/02	華人居此者，閩籍居其七，粵籍居其三，多擁厚資，為富賈，置產業，傳子孫，英人歲稅之。	鄒代鈞，〈西征紀程〉

	光緒 14/11	華人旅居星駕坡約六、七十萬，皆閩粵籍。	張蔭桓，〈三洲日記〉
	光緒 16/01	十五、六年前華民居此者八、九萬，今則十五、六萬矣。此間人民最雜，約有十數種，如閩、粵、瓊州、嘉應州、印度暨噶羅巴（雅加達）。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光緒 20/12	薛叔耘出使時，云閩、廣人約十四、五萬，今且二十一萬餘人矣。	王之春，〈使俄草〉
檳榔嶼	光緒 02/11	詢知居民十四萬，閩廣人十萬有奇。	郭嵩燾，〈使西紀程〉
暹羅	光緒 14/06/11	寓暹華民潮為最，閩次之，廣肇、海南次之，惠州、嘉應又其次也。	張蔭桓，〈三洲日記〉

資料來源：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選輯組編（1983：1、6、8、11、13、17、26、28-30、35）。

再者，從一些清代官員到海外視察的記錄當中，可以看到他們已經察覺移居海外的華人多有依籍分立會館的現象，如西貢華人「各府立有會館」（袁祖志 1983：17），⁸「有公所五，曰廣幫，潮幫，瓊幫，嘉應幫，閩幫」（薛福成 1983：34）。⁹或言「南洋風俗，隨地皆有會館，粵人尤多，有一府設一會館，有一縣設一會館」（力鈞 1983：54）。¹⁰以及「堤岸閩粵七府各商會晤。七府者：廣肇、潮州、泉、漳、福州、嘉應、瓊州及失籍之流寓華民也」（嚴璩 1983：64）。¹¹所立會館多以地緣為名，

8 袁祖志，浙江錢塘人，光緒初年曾出訪歐美。

9 薛福成，江蘇無錫人，光緒 15 年奉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

10 力鈞，福建永福人，1891 年到東南亞遊歷。

11 嚴璩，福建侯官人，嚴復長子，1905 年奉孫寶琦公使奏派，偕同該館候選主事恩慶，

尚未見有以方言為標誌者。

由於閩粵移民移居海外，皆是華人身分，彼此不再有主客或土客之別，藉此我們可以觀察人群如何分類。清治時期移居海外華人，很早就有以方言為團結對象的組織，如移居檳榔嶼之客方言人群，有組織「集賢館」或「人和館」者，但未見以「客」為幫別名稱者。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觀察記錄者本身，卻已出現以「客」名之的現象。如力鈞〈檳榔嶼志略〉中 1881 年（光緒 7 年）的記述中提到，檳榔嶼有華人四萬餘，「內含福建人、海南人、客籍人、廣府人、潮州人」（力鈞 1983：51），張蔭桓〈三洲日記〉中 1888 年（光緒 14 年）6 月 11 日的記述提到，「西貢華人分作五幫，曰廣肇，曰漳泉，曰客家，曰海南」（張蔭桓 1983：27）。¹² 以及梁啟超稱舊金山之人和會館為「客籍」等（梁啟超 1983：205）。

進一步分析紀錄者的原籍地可知，這些將海外客方言人群以「客」名之者，多為「非客」之他者身分，如力鈞係福建永福人，張蔭桓為廣東南海人，梁啟超則為廣東新會人。由此現象觀之，意味著廣府人或福老人已將在華南土客相處的認知帶入海外，用以描述海外幫別，但當時海外客方言人群所屬幫別，未見有自我定位為「客」或「客家」者。

香港崇正總會創立後，除注意與國內各同系團體聯繫外，也積極聯繫海外客屬團體。如會長賴際熙曾於 1922 年 7 月親赴南洋勸募基金，各埠客屬團體，多聞風響應（乙堂（羅香林）1950：11-12）。檳城的嘉應會館成立於 1801 年，被證實為馬來西亞最早的華族會館（吳華 1979：657），於 1925 年議決更名為「崇正總會」，此後海外客屬人士所組織團體，也紛紛更名為「客屬公會」或「崇正會」（陳向榮

前往越南各處遊歷考察兩個多月。

12 張蔭桓，廣東南海人，清末外交官，1885 年接任鄭藻如為出使美、日、秘大臣。

1890 年任滿回國，仍回總理衙門任職。

1979：94）。新馬一帶，則由胡文虎大力推動以新加坡原本的地緣性會館，如應和會館、豐永大公司為基礎，籌組「客家總會」，1923年成立籌備會，籌建會所（陳向榮 1979：94）。

除海外客屬紛將地緣性幫會名改為「崇正」或「客家」外，中國內地離散在外的客家，也開始組織以「客」為名的團體。如 1924 年上海某大學成立「客屬同鄉會」，初得會員 45 人（張鏞彰 1926：228）。由 1926 年該會會員所言，「本會之名稱，往往為同學所誤解，以為來自外省者即為客家」（張鏞彰 1926：228），可以了解以「客家」一詞指涉某一群人的概念，對粵省以外的人而言，尚屬新名詞與新用法，未必能望文生義地充分理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篇名為「客人的話」的表述文字，可見已將客家視為自我肯定或足以自豪的識別標籤：

散住在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幾省地方的有我們這些人，這幾省的主人們稱我們做客人的，長流在客人的脈管中有古中華民族的悲壯的血，他們的祖宗都是從河南等處的黃河流域，隨著宋時高宗南渡的英雄和勇士，這古英雄悲壯和榮耀的光輝，隨著那時的風尚及古社會的雅馴，清潔與壯曠，就長保留在客屬人的樸素的鄉間，這些都可以從客人的社會之發達，及他們對於革命和各種學術上的優美的貢獻裡看出來。客人之足以自豪也完全在此！……我這樣高興而驕傲地敘述著客人的話，同時我很願望——願我們大家永保客屬人的優美，優美的客屬人！L. F. 於本校醫院 2 號病室，十七，三，廿四日。（L. F. 1928：206）

另一則署名「C. F. 寫於滬江，十八，四，十」的文字，言及「優美的客屬人，負冒險性的客屬人，努力和光大我們固有的精神罷」

（C. F. 1929：211），亦可見「客家」或客屬意識對離散在外的客家遊子開始產生凝聚認同與自我肯定的作用。

1930年7月，廣東省府建設廳編《建設週報》第37期，一篇由李振芳所寫，關於客家風俗的短文，謂「吾粵客人，各屬皆有」，「分大種小種二類；大種語言啁啾，不甚開化，小種則語言文化，取法本地人，已不同於以往榛狉的狀態」（轉引自羅香林 1992：10），其中所用「猿杯」二字，以及暗示客人非漢的內容，讓服務於廣州學政軍各界之客家人士接讀大譁，甚至有要求建設廳長鄧彥華正式謝罪，著者李振芳馘首的事件發生。

於是廣州市的客家人士推饒靖中為代表，致函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要求徹底查明真相。然該報編者任大任，卻於該報38期登一啟事，說明「前載誣蔑文字，足備採風問俗者之考鏡」。此回應令旅廣州客系人士益是激憤，乃於8月3日，在廣州市的大埔公會召開客屬各團體聯合大會，推派熊長卿、沈毅等18名為臨時代表，向建設廳長提交長篇抗議文，並提出建設廳長正式謝罪、責任者解雇、刊登謝罪文廣告三項要求（宋文炳 1940：344）。各地客人團體，亦群起電檄交馳，相與詰責（羅香林 1992：10）。香港客屬總會則於8月4日舉行會董敘會，提出交涉意見，並決議推派江瑞英、陳承寬等五人為代表，攜帶崇正同人系譜與提案，赴廣州出席相關會議。此事件最後由省府主席陳銘樞於8月27日宴集客系各代表及建設廳人士，商議解決辦法，幾經調處，終以降調週報編者，並切實道歉，鄭重更正，為息事條件（乙堂（羅香林）1950：12）。

（二）邁入學術殿堂的「客家」

民國以後西人對客家的研究，在種族學風潮影響下，對客家的種性多所讚揚，再一次參與客家意識的形塑。1912年，在廣東梅縣傳教達數10年之久，自稱「中國通」的英國傳教士 George Campbell 在英國長老會與美國浸信會於汕頭舉行的宗教會議上，發表了“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客家源流與遷移）一文，主張客家南遷三波論，¹³認為客家具有優秀的「種族特性」及「民族革命」傳統，是因為他們遷徙過程中的種種經歷養成的，故而成為「中華民族裡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並且預言客家必將對「中華民族的奮發和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轉引自張英明、周璐 2005：80）。Campbell 運用達爾文的自然進化論考察客家的歷史，從中發現客家的遷徙活動也是驗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的論據，並認為其與「種族特性」的養成具有因果關係，故引起西方人類學界的高度重視（張英明、周璐 2005：80）。

1924年，美國地理學家 Ellsworth Huntington（韓廷敦）的《種族的品性》在美國出版。該書主要以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理論解釋中國的民族性，肯定 Campbell 對客家優秀的「種族特性」的評價，以及 Campbell 所提之客家南遷三波論，並認為客家遷徙即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過程（張英明、周璐 2005：80）。《種族的品性》出版後，由於客觀上適應了漢族客家民系的建構及其崛起的需要，因此深受客家文人和中國學術界的歡迎和關注。如優生學家潘光旦即將該書專門論述「中國民族性」的四章譯成中文，以《自然淘汰與中國民族性》為名，於 1929 年在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13 第一波是由 4 世紀的大饑饉和五胡亂華所引起的；第二波是始於 9 世紀震撼唐朝政權的黃巢之亂，其中光啟元年，約有 5,000 人移往於福建的西部山中。以後定居有 400 年至形成了客家的民系。第三波是始於趙宋南渡至元之滅宋。

由此，韓廷敦的《種族的品性》對中國學術界和客家學人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推展了中國學術界對「粵東人種」亦即客家問題的重視以及研究工作的展開。當時顧頡剛、洪煨蓮、羅常培、李濟之、潘光旦、范捷雲等著名學者，都因此鼓勵客家研究，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並率先將「粵東人種」問題列為重點研究項目之一，委派羅香林返回嶺南故鄉實地考察，並負責編輯《客家史料叢刊》。從此以後，客家問題從嶺南客家文人圈走向中國學術界的殿堂，發展成為中國學術界中的一門顯學（張英明、周璐 2005：81），進而促成 1933 年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之出版。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首先系統地梳理了 19 世紀以來中英文獻對於客家的描述與研究，從族譜資料中整理出客家五次南遷路線，將客家描述成一個具有中原血統、在不同時期南遷的「民系」，認為客家一系形成於趙宋、客家基本分布地域為閩贛粵三地、客家方言傳承中原漢音等等，並以行政區域劃分純客縣與非純客縣，以及論說客家與革命的關係。

民初以來客家在黨政軍方面漸具實力，已能充分掌握自我族群的論述權，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以看似客觀的學術論證方式，從各種不同面向討論客家之源流、居地、特性等，集清至民初以來客家士子正名論述之大成，讓他從此被視為客家研究的奠基者（陳支平 2006：283；程美寶 2006：251）。而《客家研究導論》之出版，成功地在 20 世紀塑造出客家人正面的歷史和形象，對於客家的形塑與客家地位的提升，有其特殊的意義。該書出版之後，「客家」一詞開始被收入許多辭書之中，雖詳略有別，實大同小異，所據均為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張衛東、劉麗川 1989：96）。如商務印刷館 1940 年版辭源有言：「廣東潮梅等處，有客家一族，蓋由他處遷來，土人以是稱之耳，其族

多能中原語言」（轉引自中原客家聯誼會 1971：42）。

綜上可知，1930年代華南客家的形塑，已經完成由「邊緣客域」回流「中心客區」，再由「中心客區」向外擴散至海內外的離散客家的過程，而且，關於客家的相關論述，在國內客籍學人與西方傳教士、學者的參與之下，內容幾已齊備，羅香林的客家論述，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和文獻積累的基礎上產生的（程美寶 2006：256）。因此到了羅香林以學術的理路完成《客家研究導論》，可謂已是水到渠成。

此外，該書之出版對海外客屬組織之發展也有所影響。1930年代中期，正值胡文虎在東南亞一帶推動南洋客屬總會之階段。1940年新馬一帶的「南洋客屬總會」舉行開幕儀式，公推胡文虎為正會長，湯湘霖、藍禹甸為副會長。胡文虎呼籲「天下客屬本一家，都是同聲同氣同風俗的，實不該因畛域之區別而疏遠」，並派代表到馬來亞各地，推動設立「客屬分會」（陳向榮 1979：94）。在號召新馬各地倡組分會之時，胡文虎認為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中關於「客家族源」的基本立論適足以用來宣揚客家族群意識，乃催促同仁往赴各地倡組客屬公會時，乘機推銷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張侃 2005：43-76）。就這樣，在當時抗日的氛圍裡，胡文虎結合自身的經濟財勢，利用中國現代複雜的歷史環境和客家在海外的特殊境況，推動了一次海外的客家認同運動，除了提高其個人名望與社會地位，以及擴大其商業資本網絡之外（安煥然 2010：894-896；元一 1950：14），也藉由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進一步推動的海外客家的認同。

六、結論

華南客家的形塑過程，有一個文化共性的形成時期，之後才有第二階段的客方言群意識覺醒期。約於宋元之際，閩粵贛邊區已形成有共同方言與地域文化的一群人，但當時並未被以「客」名之。

明清時期，閩粵贛邊區人口飽和，加上清初遷海復界之後，大量客方言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一帶流徙，在這些客方言人群外移的邊緣，由於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分，加上人數漸增，方音殊異，與當地以廣府方言為主的「本地人」之關係遂逐漸緊張，進而在 19 世紀以降，頻頻發生「土客衝突」，且在廣府人書寫的志書當中，多被指為「非漢」之種族。此種現象，引起「邊緣客域」或「中心客區」客方言士子的關注，並以強調客方言人群乃中原衣冠舊族，方言亦為中原古音的方式為「客」溯源。在此過程中，適逢西教東傳，於是以客方言地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們也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行列，就約在 19 世紀中葉，中文的「客家」與西文的 **Hakka** 有了指涉相同人群的意涵。

客方言士子與西方傳教士為「邊緣客域」的客方言人群溯源美名之後，為「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嘉應州）鋪好了溫床，到了光緒末年的《嘉應州志》，我們已可看出「中心客區」如何思索由文獻中找出「中心客區」為「客」名所出的各種可能，於是「客家」與宋元文獻中的「客戶」增盛說牽扯上關係，也於是之後許多的「客家」溯源，都免不了要在文獻中找「客」蹤。

「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之後，開始讓由「中心客區」向外離散的客家有了認同的媒介，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城市活動與革命建國等行動，逐漸累積政經實力的同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非漢」

污穢，更讓「客家」的意識與認同得以抬頭，也讓海內外客屬有了清楚的以方言認同的媒介。然而，就是由於華南的客家形塑，由「邊緣客域」回「中心客區」再向外散播的軌跡，因此在軌跡之外的客方言人群，對「客家」的了解與接受則就可能有所不同。

參考文獻

- 乙堂（羅香林），1950，〈香港崇正總會發展史〉。頁 1-26，收錄於香港崇正總會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 力鈞，1983，〈檳榔嶼志略〉。頁 48-56，收錄於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選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北京：海洋出版社。
- 小島晉治著、何培忠譯，1983，〈試論拜上帝教、拜上帝會與客家人的關係〉。頁 291-305，收錄於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編，《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
- 中原客家聯誼會，1971，〈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成立緣起〉。《中原文獻》3(10)：42-43。
- 不著撰人，1881a，〈粵東客匪案書後〉。《申報》，1月3日，版1。
- _____，1907a，〈牌示更正鄉土歷史教科書〉。《申報》，5月12日（光緒33年4月1日），版11、版12。
- _____，1907b，〈六屬學會力爭種族問題〉。《申報》，5月22日（光緒33年4月11日），版12。
- _____，1907c，〈江督為改正新書事札滬道文〉。《申報》，9月14日（光緒33年8月7日），版18。
- _____，1919a，〈粵人力爭電車合同之公電〉。《申報》，11月7日，版10。
- _____，1919b，〈旅京粵同鄉致滬旅粵團體電〉。《申報》，12月14日，版10。
- _____，1933，〈關於華南民族的通訊：羅雅達先生函（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2(1)：133-34。

- _____，1936，〈使領館消息：駐檳榔嶼領事館通訊：（二）黃領事發表客族來源之談話〉。《外部周刊》143：15。
- 王大魯修、賴際熙纂，1967，《廣東省赤溪縣志》。據民國9年(1920)刊本影印，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5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 王東，1996，《客家學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_____，2005，〈客家研究的新視野：讀《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客家文化研究通訊》7: 169-183。
- 王明珂，1997，〈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頁129-165，收錄於黃應貴、葉春榮編，《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王概修纂，2001，《高州府志》。收錄於《故宮珍本叢刊》，第181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 毛鴻賓，1969，〈擒獲客匪首逆戴梓潰餘眾求撫摺（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頁1479-1489，收錄於孫葆田等編，《毛尚書奏稿》，第2冊，第15卷。臺北：成文出版社。
- 元一，1950，〈客屬海外各團體之組織與發展〉。頁1-34，收錄於香港崇正總會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 安煥然，2010，〈馬來西亞柔佛客家人的移殖形態及其認同意識〉。頁887-910，收錄於莊英章、簡美玲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 何國強，2002，《圍屋裡的宗族社會：廣東客家族群生計模式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 吳松弟，1997，《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

建人民出版社。

吳宗焯修、溫仲和纂，1968，《廣東省嘉應州志》。據清光緒 24 年 (1898) 刊本影印，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廣東省》，第 117 號。

臺北：成文出版社。

宋文炳著、小口五郎譯，1940，《支那民族史》。東京：大東。

宋德劍，2002，〈序言〉。頁 5-12，收錄於房學嘉、邱國鋒、謝友祥編，《民間文化與鄉土社會》。梅縣：花城出版社。

李文澤，1995，〈四川的客家人和客家方言〉。《中國典籍與文化》1: 29-31。

李如龍，2000，《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杜文瀾，1980，《平定粵寇紀略》。收錄於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資料匯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

汪毅夫，1994，《臺灣社會與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屈大均，1979，《廣東新語(二十八卷)》。影印本，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二十四編》，第 10 冊。臺北：新興書局。

林達泉，1967，〈客說〉。頁 131-35，收錄於溫廷敬輯，沈雲龍主編，《茶陽三家文鈔：何如璋、林達泉、邱晉昕》。臺北：文海出版社。

施添福，1987，《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_____，2010，〈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河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3/3)，子計畫二十五：清代臺灣新苗地區的粵人與粵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_____，2011，〈從「客家」到客家：一個族群稱謂的歷史性與地域性分析〉。論文發表於「第三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究

- 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9月23-24日。
- 洪仁玕，1969，〈資政新篇〉。頁255-306，收錄於葉恭綽編，《太平天國官書十種》。臺北：華文書局。
- 洪仁玕述、Theodore Hamburg（韓山文）著、簡又文譯，2000，〈太平天國起義記〉。頁829-878，收錄於王重民編，《太平天國》（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希張等，1997，《客家風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唐立宗，2002，〈敬恭桑梓：近代廣東志書的編纂活動與「客家」論述〉。論文發表於「第二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12月24日。
- _____，2005，〈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論文發表於「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風學社主辦，12月24日。
- 徐珂編，1966，《清稗類鈔·種族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袁祖志，1983，〈瀛海采問紀實〉。頁16-18，收錄於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選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北京：海洋出版社。
- 張侃，2005，〈胡文虎與馬來西亞客家社團關係初探〉。頁43-76，收錄於林金樹編，《中華心·客家情——第一屆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學研究會。
- 張英明、周璐，2005，〈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5(6): 77-83。
- 張衛東、劉麗川，1989，〈論客家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頁94-118，收錄於張衛東、王洪友編，《客家研究》，第一集。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 張蔭桓，1983，〈三洲日記〉。頁 231-244，收錄於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選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北京：海洋出版社。
- 張鏞彰，1926，〈客屬同鄉會（附照片）〉。《滬江年刊》11: 228。
- 曹樹基，1997，〈清代前期浙江山區的客家移民〉。頁 1-13，收錄於《客家學研究》（第四輯）。上海：歷史教學問題雜誌社。
- 梁啟超，1983，〈新大陸游記節錄〉。頁 186-216，收錄於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選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北京：海洋出版社。
- 許懷林，2000，〈棚民·客籍·客家意識：義寧州客家的歷史實際〉。《嘉應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8(2): 98-103。
- 郭嵩燾撰、楊堅校補，1983，《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
- 陳一新，1962，〈跋瞻學田碑〉。收錄於王象之，《輿地紀勝》，第 132 卷。臺北：文海出版社。
- 陳支平編，2006，《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合肥：黃山書社。
- 陳向榮，1979，〈本會四十年大事記〉。頁 94-109，收錄於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週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週年紀念刊》。檳城：檳榔嶼客屬公會。
- 陳昌齊等，1968，《廣東通志》。據清同治 3 年 (1864) 重刊影印，收錄於《中國省志彙編》，第 10 號。臺北：華文書局。
- 陳春聲，2005，〈韓江流域的社會空間與族群觀念〉。論文發表於「區域再結構與文化再創造：一個跨學科的整合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5 月 15-16 日。
- 陳志喆等修、吳大猷纂，1967，《四會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 陳坤，1959，〈粵東剿匪紀略〉。頁 400，收錄於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編，《紅巾軍起義資料輯》（二）。中山：廣東中山圖書館。

- 陳承寬，1950，〈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刊序〉。頁3-4，收錄於《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 陳翰笙編，1985，《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一輯（二），中國官文書選輯）。北京：中華書局。
- 曾運乾、朱希祖，1933，〈審查客方言報告書〉。《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4): 21-23。
- 湯錦台，2010，《千年客家》。臺北：如果出版社。
- 程美寶，2006，《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
- 黃釗，1970，《石窟一徵》。收錄於《中國史學叢書續編》，第11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黃金文，2001，《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黃遵憲，1973，〈梅水詩傳序〉。收錄於張煜南，《梅水詩傳》。臺北：張穎基。
- 萬芳珍、劉綸鑫，1994，〈客家入贛考〉。《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1): 118-127。
- 鄒魯、張煊，1933，〈漢族客福史〉。《大聲月刊》94/95: 10-18。
- 管一清修纂，2001，《增城縣志》，據清乾隆19年(1754)刻本影印，收錄於《故宮珍本叢刊》，第166-167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 劉平，2003，《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鎮發，2001，《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
- 劉佐泉，2003，《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劉澐年修、鄧掄斌等纂，1966，《惠州府志》。據清光緒7年(1881)刊本影印，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東省》，第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 劉綸鑫，〈贛西北客家和客家方言〉。《第四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網路資料）。
- 劉鎮發，2001，〈「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以及相關討論）〉。《客家風情》，<http://www.hakkaonline.com/forum/thread-48194-1-1.html>，取用日期：2012年11月25日。
- 鄭昌時，1979，《韓江聞見錄》。據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本影印，收錄於《潮州文獻叢刊》，第4號。香港：香港會館董事會。
- 黎鶴輝口述，1962，〈貴縣慶豐公社黎鶴輝口述〉。頁41，收錄於廣西僑族自治區通志館編，《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調查資料匯編》。南寧：廣西僑族自治區人民出版社。
- 龍啓瑞，1995，《經德堂文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戴昭銘，1996，《文化語言學導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 薛福成，1983，〈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頁33-43，收錄於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編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北京：海洋出版社。
- 謝重光，2001，《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鍾幼蘭，1994，〈臺灣民間社會人群結合方式的構成與發展：以臺中縣神岡鄉大社村為例〉。頁109-144，收錄於中研院民族所編，《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鍾用鈇，1921，《粵省民族考原》。出版地不詳：卷密精廬。
-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
- 羅爾綱，1947a，《太平天國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

- _____, 1947b, 《太平天國史叢考》。重慶：正中書局。
- 羅獻修修纂, 2011, 《興寧縣鄉土志》。清抄本, 收錄於倪俊明編,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 第 40 號。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譚樹林, 2010, 〈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頁 178-193, 收錄於特木勒編, 《多元族群與中西文化交流：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嚴璩, 1983, 〈越南游歷記〉。頁 56-72, 收錄於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編輯組編, 《晚清海外筆記選》。北京：海洋出版社。
- 嚴忠明, 2004, 〈「豐湖雜記」與客家民系形成的標誌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5(9): 36-39。
- 顧炎武, 1981, 《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C. F., 1929, 〈客屬同鄉會〉。《滬江年刊》14: 211。
- Eitel, Ernest John, 1867,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6): 65-67.
- Eitel, Ernest John, 1873,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China Review* 2(3): 160-164.
- Hamberg, Theodore, 1854,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Office.
- L. F., 1928, 〈客屬同鄉會〉。《滬江年刊》13: 206。

